

西南大学记忆

➤ 名师风采

果树专家董时厚

➤ 档案拾遗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成立

➤ 校史校情

至乐桃林沾化雨 佳作偏映夕阳红

——从一支铅笔引领我进入艺术殿堂的郭克先生

柳亚子赠诗刘兆吉之始末

➤ 影像记忆

西南农学院师生学习毛泽东著作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14年第3期
(总第24期)

靈

浣溪紗
 莫道天公有慈心 錯定姻緣玉和金 忍聽擊兒夜
 悲吟 才貌蓋世兼癡情 一生私願負同衾 幽魂縷
 縷昇仙境

浣溪紗
 怡紅公子異凡人 為慰擊兒泉下靈 名科一場入
 空門 夫人釵娘哭昏沉 更有襲人慟永別 始信人
 間貴真情

浣溪紗
 隔岸凝觀汽輪開 閨中未便遠送行人 問懊惱是
 深情 欲寄錦書表密意 恐笑癡情羞愧深 此翻心
 事江水明

巧計安排苦用。
 莫道天公有慈心 錯定姻緣玉和金 忍聽擊兒夜
 悲吟 多年心事空纏繞 一生私願負同衾 幽魂縷
 縷入地陰

二
 惜紅公子雅情深 追憶擊兒撫琴音 名科一場空
 門尋 寶釵已知歸難再襲人 偏自哭昏沉 始信人
 間貴真情

紅塵不戀 見情真 決浴襟

空門終願 舟被身

思愛未

江南稿紙

吴宓老师为邹兰芳批改的稿子^①

^① 本图片由江家骏老师提供。

刊首语

□文/张晓华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时光像一个跳动的音符,穿过四季的斑驳,谱写着一首首生命之歌。时光又像一条流动的河流,流过岁月的年轮,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时光最短,又最长;最浅,又最深;最浩浩荡荡,又最不动声色。时光划过,一念便是海角天涯,回眸已是山高水长。倏忽之间,多少念念不忘的人终被遗忘,多少过往终被流年的风吹散得了无痕迹,又有多少往事沉淀在心底汇集成了——一道雕琢的风景。岁月苍老了我们的容颜,却留下了属于我们的故事,或悲或喜,或长或短。

人生就如同在时光隧道里的一次漫长的旅行,既有青山绿水,也有平淡无奇,更有崎岖坎坷。不悔错过的阳光,不惧即到的风霜,该走的走,要来的来,淡看云卷云舒,笑看潮起潮落。当我们驻足、回望时,依然心存流连、无怨无悔。

西南大学记忆

2014年第3期(总第24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李明 靳玉乐
李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编：黄敏

执行主编：张晓华

编委：郭兰 刘润

编辑：范韵杰 周凤 郭江红
李梦露 姚楠 蒋云燕

美编：刘润

校训：



目

刊首语..... 张晓华

名师风采

4 果树专家董时厚 封期平

档案拾遗

9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成立 张晓华

15 北碚农学院的点点滴滴 郭兰

校史校情

18 至乐桃林沾化雨 佳作偏映夕阳红
——从一支铅笔引领我进入艺术殿堂的郭克先生 ... 方凤富

21 自幼爱艺,终身受益
——记郭克先生的美术创作人生 周凤

25 记忆中的董时进 封期平

30 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董时进 封期平

34 柳亚子赠诗刘兆吉之始末 刘重来

38 诗人老去风情减,犹有峨眉伴晚晴
——记吴宓和邹兰芳一些往事 江家骏

录

校友天地

42 我在巴山育黄羊

——记王维春校友 谷剑飞

影像记忆

46 西南农学院师生学习毛泽东著作 张晓华

西大掌故

51 反逮捕斗争 牟乔雅

校史论坛

52 高校校史编研中的轻重得失及对策

..... 郑 慧 李燕芳

封面人物 董时厚

封二 吴宓老师为邹兰芳批改的稿子

封三 荀运昌书法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250107
13436041609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0107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果树专家董时厚

□文/封期平



董时厚教授^①

董时厚于 1898 年出生于重庆市垫江县。早年与堂弟董时进一起离家赴上海求学,但是父母不同意。由于没有家中的经济支持,为了省钱,他们凭着求学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在垫江历尽千辛万苦,磨破双脚,穿烂几双草鞋步行到长寿后,才坐船奔赴上海求学。在上海,他们考入南洋中学就读高中,毕业后又一同去北平,考进国立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前身之一)。1923 年董时进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董时厚考入美国艾瓦华(又名艾奥瓦)州立大学,攻读园艺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董时厚应聘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果树栽培研究工作。一年后回国,不久又去日本工作、考察了 3 个月。

回国后,董时厚先后在京师大学、河北省省立大学等校任教授,讲授过“果树栽培学”“作物通论”“普

通土壤学”“蔬菜栽培及园艺”等课程。1935 年进入江西省农业院任首席园艺技师,历时 3 年。3 年中,董时厚亲手创办了 3 个试验场和 3 个果树苗圃。因为是创办,时间很短,仅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董时厚先在南昌院本部建立果树和蔬菜试验场,搜集国内外果蔬名种,进行地区试验。为了恢复南丰的蜜桔,董时厚受命到南丰县开辟苗圃、推广育苗。因南丰苗圃面积太小,又在南城另辟一圃地,都是用来培育南丰蜜桔苗。同年又在上饶县辟一圃地专为培植上饶雪梨,以供民间栽培。除在南昌院本部进行试验建设外,又在南昌北郊乐化地方开垦了 200 余亩荒地,建立一个果树试验场,栽培落叶果,观察落叶果对荒地的适应性。1936 年又到三湖地方建立柑桔试验场。

抗战爆发后,董时厚于 1937 年 12 月底辞职回到重庆。在重庆期间他先在江津园艺改良场任技正兼场长,后在西昌农艺专科学校任教授。董时厚用所有积蓄在南山买地 20 余亩办了个“厚生”农场,自己经营果树,做一些试验研究。农场种了柑橘、桃、柠檬、樱桃、夏橙等水果。在农场,他都是亲自动手栽培、剪枝、翻土、锄草、播种、育苗、浇水、施肥。他在厚生农场最大的成功是开创了在重庆近郊种西瓜的历史。重庆近郊是红壤土,而不是适宜种西瓜的沙土。为了在重庆近郊种西瓜,他付出了很多精力,特别是到了西瓜快成熟的季节,他与农工们一样,整天戴着草帽,顶着烈日在瓜田里锄草、翻晒西瓜,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重庆近郊成功种出来了又大、又甜、水又多的非常好吃的西瓜。董时厚的女儿回忆说:“他的成功正是其在实践中,发扬了不怕困难、肯于吃苦、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结果,是对自己的事业勇于探索、追求不懈的结果。”不久后,国民党军队开来驻在

^①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1211-003。

果园附近,他们白天摘瓜果,夜里偷蔬菜,农场损失很大,无法维持。1941年,董时厚不得不停止经营,重新过着公教人员的生活。解放后,董时厚将“厚生农场”捐献给了当地政府。

1942年,董时厚任重庆市私营华府兴业公司经理。后来先后任过四川农业改进所技正兼江津园艺场场长、垫江初级中学校校长等职。1946年,董时厚在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至1950年,董时厚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授,除教书外,还进行了增聘教授、助教及基地建设工作,如开辟果园和菜园、建造温室和温床、购置图书仪器等。他还参加了西南农学院的筹备工作。

1950年西南农学院宣告成立,董时厚被调来任教授兼园艺系系主任、果树栽培教研组主任。他还曾兼任西南农科所果树室主任,重庆市园艺学会理事长,四川省园艺学会理事,四川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农学院支社副主任委员等职。

二

小时候经常听哥哥姐姐们说起在夏坝时,董时厚家与我们家是隔壁邻居时的种种轶事。自西农搬到天生桥后,我们两家就基本没有来往了,其主要原因是:虽然都在一个学校却不在一个系。我父亲在植保系,董时厚在园艺系。另外还有两个原因是:一方面是地域原因,我们家住在斑竹村,董时厚家住在黄桷村(后改为黄树村),那时斑竹村与黄桷村之间是大片的农田,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外面漆黑一片,田野间还有野狗流窜,哪里还敢串门;另一方面是政治原因,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被错划为“右派”,母亲生怕连累别人,同娘家的兄弟姐妹断了一切联系。父亲平反昭雪后,母亲与兄弟姐妹联系,才知道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姊妹们仅剩一个七妹了。

我所知道的与董时厚有关的事有两件。一件是董时厚的女儿。童年时有一年咳嗽老不好,寒假从大姨家回北碚后,母亲带我去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简称九院)看病,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她不仅人和气,而且看病也很认真。自从那次吃了她开的药后,几十年我都没再咳嗽过,直到中年以后才偶尔咳嗽一次。她为我看完病后,还和妈妈亲热地摆了几句

“龙门阵”。从医院出来,母亲对我说这个医生就是董时厚的女儿。后来,我听哥哥姐姐们说起董时厚的这个女儿:“那时全国人民都以艰苦朴素为荣,都穿青蓝二色的男女老少样式不分明衣裤,只有她敢穿其他颜色而且样式不同的衣服。特别是到了夏天,她穿着连衣裙,头上扎着灵动的真丝蝴蝶结,骑着自行车从黄桷村到北碚九院上班(那时有自行车的人很少,整个西农,我知道的拥有自行车的不足十人),比现在开宝马还拉风,特别是在过西南师范学院大校门后到现在的环城路口那段长下坡时,她骑着自行车直冲下去时,衣裙飘动,简直就像仙女下凡。”另一件是董时厚给我送钱和粮票。文革期间,我们家几口人只有不够生活的18元“生活费”。那段时间,父亲长期在夏坝、合川农场劳动,家中只有妈妈、妹妹和我。妈妈自“灾荒年”后,身体很差,常常生病,领“工资”的任务就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去学校财务室翻遍了所有工资单,就是找不到我父亲的名字。财务室的李育贤嬢嬢好心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工资’,是‘生活费’。”她边说边递给我几页名单。我一看,那上面全是当时被打倒的人。我很快就在上面找到了父亲的名字,发现扣了房租水电费10.65元后,只剩下7.35元钱。回到家惊喜地看父亲刚从夏坝农场回来了,可是马上又得知他第二天早上要到合川农场去,我只好将这7.35元全给了他。我和妹妹只有靠每天割牛草卖到学校牛奶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时国家供应的限量口粮米是1.42元10斤,牛草每斤卖0.5分,我和妹妹暑假顶着烈日割284斤牛草才能买到10斤米。武斗最严重时,农场不收牛草,我们家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在最困难时,董爷爷(董时进是我父亲的老师,董时厚是董时进的哥哥,所以爸爸妈妈教我们家的孩子从小都这样叫)和董婆婆到我家来,给了母亲一些钱和粮票。这真是雪中送炭。那次董爷爷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多年后我了解到他那时也被停发工资,处境也不好,靠子女和亲戚的支援维持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下他能来看我们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呀!何况,当时他又能说什么呢?董婆婆操着好听的普通话,给我母亲说了一些贴心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哎呀!你们一家每月才18元钱,这怎么过呀?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给我说一声呀?”

关于这件事,我从董时厚的女儿董保智写的《回忆我的好父亲》一文里也得到了印证。她在文中写到他父亲对她的诸多教导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母亲有位东北老乡,解放初期全家来到重庆,身体不好又经济拮据。一住就是数月,(他们)有一女儿还患有晚期肺结核,经常咳血,当时是医不好的,像这样的情况,一般人是不会收留。但父亲从未表示嫌弃,直到那孩子病死在我家,直到他们找到去路愿意走时。又如父亲一远亲,是地下党外围的积极分子,被国民党(特务)盯梢后,便来到我家避难,父亲虽然搞不太清楚,但多少知道他有点政治色彩,却仍一直把他保护在家直到脱险。”“父亲认为人家有困难,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我们能帮人的尽量去帮,谁敢保证一辈子不遇到困难?他时常对我说:人生活在世界上要互相帮助,无论是经济上、生活上、学习上还是工作上,能帮人的地方,一定要尽力去作,而且不要计较对方是否有回报。”“在做人的方面父亲还特别强调:千万不能忘记别人对你的帮助,特别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别人给予的帮助更加珍贵,更应一辈子不忘!父亲还说,更不能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这是做人极不道德的品质。”“父亲还特别强调,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话看似简单,平平淡淡的,但能真正做到的能有几人?董时厚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还要求子女这样做,充分体现了他的高尚品德。

三

董时厚从小就讷于言。他女儿在《怀念我的好父亲》一文里写道:“父亲出生后竟一直不会说话,人们都以为他是哑巴……1933年的除夕,一声巨大的炮竹声,震响了他那已沉睡了5年之久的声带,他兴高采烈、欢蹦乱跳地从朝门(院子的大门)外跑回家堂屋里,一只手指着朝(大)门口大声地对祖父说‘放鞭炮了!放鞭炮了!’他突然大声说话,成了一个天大的喜讯,顿时全家一片欢腾,只听到他父母、我的爷爷奶奶连声说:‘老天爷,我的儿子会说话了!’‘董家福星高照’‘董家主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了啦!’”父亲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也不爱笑,经常一个人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沉思,或看书报、杂志,好似很严肃,小时候兄弟姐妹都很害怕他,都不敢单独与

他接近,也不敢和他多说话,更不敢和他打闹说笑。

董时厚虽讷于言却敏于行,学生时代就是体育爱好者。据他女儿董保智回忆:“父亲很喜爱体育运动,早在北平读大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体育运动。小时候一次在家中晾晒衣物时,我曾看见一个(面)用呢子做的并镶有缎子边的三角锦旗,是他们北平农业专门学校足球队比赛获胜的荣誉奖品,名次我忘了。听母亲讲:‘那时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校足球队的领队是胡子昂先生(胡子昂解放后任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父亲那时踢球水平很高,是校足球队的核心人物,比赛时总戴一副黑颜色的手套,绰号‘黑手套’,在场上担任中锋,是球队的主要射手。每次参加比赛都惹得看台上的美女粉丝们大叫:‘黑手套,黑手套,看哪!黑手套上场了!’那面锦旗是足球赛获得的三角锦旗,只是记不得那上面绣的是第几名了。”“1921年父亲还荣获过校网球比赛冠军,获一银质奖杯,上面刻有‘网球第一董时厚’的字样,是父亲非常珍爱的纪念品。一直被摆放在客厅显眼的茶几上,因为他小时候从没见过网球,更不知如何去打,他全是在北平农业专科学校体育老师的指导培养下,(自己)勤学苦练的。(所以)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时,我们将这一奖杯捐赠给该校了。”“他还会游泳,有一件(他)十分喜爱的高档连身羊毛游泳衣,因洗小了不能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我上大学时父亲把它送给我了,看到式样如此新颖而又别致的泳衣,我高兴极了,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穿上父亲这件漂亮的游泳衣,在水中遨游!’但由于我胆量太小未能学会,辜负了他的一片希望。”

董时厚治学严谨,为人厚道,谨言慎行。他讲授过“苗圃学”“果树栽培学”“果树营养生理”等课程,曾与人合编《果树栽培学》教材,并编写《果树营养生理》讲义,合译过《第一届国际柑桔会议论文集》一书,并主持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坚守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良知。见到学生,他一有机会就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专业课,用功学外文以便继续深造。在大跃进中,原来的70多万个农业社合并为2万多个公社。他认为公社发展太快,而且由年轻无经验的人来领导,可能会导致农业减产。学校搞稻子放产10万斤,他虽然没参

加,但在思想深处认为是不可能的。后来稻子颗粒无收,他认为高等学校做这样的试验太缺乏科学知识,是不应该有的。在反右斗争中,他除了发表“教授治校”的言论,还认为右派划得太多,许多能教书的教师都成了右派,对于教学来说不无影响。他还坚持认为江之鉴、刘佩瑛、李友林等右派分子知识渊博,教学效果好,应该让他们重新上台讲课。这三位教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怀着满腔热情从美国回来的博士。他们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都被划为“右派”。在那个时代的政治高压下,好多人连招呼都不敢与他们打,不对他们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可是董时厚还敢为他们“摘帽”,并让他们上台讲课。他的这一大胆的举动,让他们能更好地为国为民为学校多做贡献,却让他在文革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董时厚的高尚品德,使我想起学校还有一个如此高尚品德却英年早逝的李世俊院长。我记得父亲被划为“右派”后,有好几次下班回来都满脸放光地将母亲拉进他们房间,抑制不住满心高兴地对母亲说:“今天李(世俊)院长找了我,跟我谈了话,鼓励我,说很快就要落实政策,要我放下包袱,做好思想准备,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走上讲台……”父亲及我们全家满怀希望等待的好消息。虽然每次都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推移而渐渐变成了泡影。但李院长都每一次找父亲谈话,对父亲能在困境中熬下来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埋怨过任何人,可是我总觉得这事李院长都亲自找过父亲几次,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政策迟迟没落实应是下面部门怕事所致吧。如果都能像董时厚这样实事求是地工作,当年的冤假错案不知要少多少。

董时厚不但关心和救助那些已被打入另册的人,还尽力支持、勤勉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做学术报告,参加系里的研究工作。

由于一贯谨言慎行、少说多做的性格,董时厚平安地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关卡,就连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反右扩大化,他不但平安地过关,而且还在1956-1962年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并且还在1957年加入了“九三学社”。1963年,董时厚还当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

四

尽管董时厚谨言慎行,可文革刚刚开始,炮轰他的大字报就出来了,他一夜未眠。1966年10月,他家被红卫兵查抄了,家里仅有的221元存折也被拿走了,甚至粮票和购粮证都拿走了。他被下放到园艺场和夏坝劳动。后来又说他残酷剥削农民,雇用厨师,过着像地主一般的豪华生活,为此他还遭到了几次拳打脚踢。他的那个曾给我看过病的女儿,也在那时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件事对一贯疼爱孩子的董时厚夫妇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抄家物资被安排在北碚办展览,家属委员会还组织家属去北碚看展览,我至今仍记得解说员义愤填膺地指着那些东西说:“你们看这就是董时厚家的资产阶级式的腐化生活,这是他家的中餐餐具,有几套,而且还有几套西餐餐具。连他在九院当医生的女儿还没出生的孩子,他们都准备了好多套四季的各式衣服被褥……”

我听了心中暗暗吃惊、害怕,想到董时厚不仅不是地、富、反、坏、右这些当年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且还是人民代表。他的那个在九院当医生的女儿的丈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个军官。董时厚夫妇和他的这个女儿应该都是军属,连他们家都被抄家,还被拿来办展览,这真是不可理解。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看得面面相觑,去的路上还有说有笑,回家时谁也不说话,都显得心事重重。我和妹妹一回到家,就马上向妈妈描述了展览中的情景,特别说了那些中餐餐具与我们家的很像。妈妈马上将那几个漂亮中餐餐具拿出来砸烂。它们实在是太漂亮了,碎片也舍不得扔,况且扔出去也太显眼,怕被有心人看见,去检举揭发我们“消灭罪证”,所以我们将它埋在房子旁边的土里了。然后将家中的西装拆成一片一片的。又想起家中有一顶有一圈帽檐的“礼帽”,小时候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这样的帽子,而且这种帽子是电影中的资本家、特务和坏人才戴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得戴这种帽子。我们这些小孩就认为那就是特务和坏人的标志,经常拿着帽子问父母:“家中怎么有这种帽子?”这帽子我们怎么也不顺眼,它唯一的用处就是我们小孩子拿来演戏时扮坏人

用。这次也赶紧拿出来用剪刀将它大卸八块,这一剪才知这东西还结实得很,它完全不是纺织的,而是用现在所说的“羊毛绒”经高温压制,又用冲压工艺制成的,整个帽子没有接缝。我们自以为已经将家中的“封、资、修”的东西消灭干净了。可是对那尊慈眉善目、妩媚漂亮、手挽一个装满蟠桃篮子的王母娘娘瓷像,我们心存侥幸,舍不得砸。因为家中有了她,我们无论在外受了多大的委屈,回家一看见她那安详美丽端庄的神态,抱抱她,就什么艰难困苦、什么侮辱委屈都烟消云散了。结果是,红卫兵一进屋就发现了这个“封、资、修”的罪证,马上将她抱出去摔得粉身碎骨,还将我母亲打骂了一顿才离开。

文革后期,我们下乡当知青。开始几年回家过年时还偶尔能看见董婆婆,后来就没看见了。听母亲说,他们到河北保定去了,因为董婆婆的娘家人

在那边。1975年4月,董时厚在河北省保定市病逝。5月,西南农学院为他举行追悼会。他一生为国为民的功劳,最后终于得到了政府的肯定,他的骨灰也被放进了保定市烈士陵园的革命干部堂中。1991年5月董夫人病逝,但董夫人不属能进烈士陵园的范畴,子女遵照其遗愿,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重庆市屏鼎山公墓。

由于我们家那几年的境遇,加上我们家的孩子几乎都比他家的孩子小十来岁,所以自董时厚离开西农到了保定,我们家就与他们家彻底断了联系。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家几姊妹一直都很想念董爷爷、董婆婆,团聚时都要提到他们,哥哥还经常对我们说:“你们记住今后不管是谁要是见到他的子女,都要好好感谢他们父母在我们家最困难时的雪中送炭。”

后记:

我写本文,仅凭小时候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零星记忆,是档案馆的张晓华同志不辞辛苦地查找档案资料,为本文增添了不少关于董时厚的专业方面的内容和人事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要感谢档案馆的同志们,是他们殚精竭虑的工作,使那些曾为学校工作过、贡献过的被历史淹没的前辈们的事迹得以重现天日,昭示后来人,也使本文臻于完善。还要感谢档案馆的张洪瑜馆长和牟乔雅同志的多次鼓励,才使我这个退休之人能提笔将这些已尘封了的往事写出来。

(编辑 蒋云燕)



此件經最終院務會議十月廿日校對完訖
請改組四川鄉村建設學院為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案

理由

查備案存件示核者

(1) 四川鄉建學院辦理已歷四年能有現在規模實屬不易除本科及專修科不計外其他如擴充寺謝村教育農藝區磁器口社會事業改進會簡易民衆教育師資師範民衆學校及小學中心農場合作社農業技術人員訓練學校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等皆具有相當成績茲為保持院成事業并確立吾川鄉建基礎擴展吾川鄉建運動計擬仿照法蘇省立教育學院先例改組為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俾在現行學制系統中有其法令地位以期早日完成鄉村建設復興民族文偉大使命

(2) 現在一般大學雖有教育學系久設但多偏於教育理論

論文研究本院則擬在教育應用與鄉村教育方面特為注重近年來提倡鄉村教育鄉村建設之聲浪雖高但人才仍感缺乏故本院即擬設專此項管幹人才訓練有人才一切自易舉辦

有人以為此種無限制的訓練將來畢業出路即成大問題此種說法自有相當理由不過吾人若是有計劃的訓練自不能有大規模發生莫則此種人才需要的地方正多如各縣縣政府區公署各中小學校各民衆教育機關等處無不在在需人乘之看政府之如何預為安排且本院既有農藝區又副置農藝區各種農幹人才即當以本院學生任之也

(3) 去年教育部兩次派員視察本院即有轉飭改組之令

关于改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提案(第1页)^①

^①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22-0001-00001。

第八〇八七九號訓令嗣後陳孔汝先生奉部令視察西南教育亦經詳查本院內容發表意見去張改為省立教育學院

本院訓練鄉村教育人才最樞目的仍在建設鄉村復興民族建設鄉村復興民族為目前中國救亡圖存久要者此乃盡人皆知但此種偉大事業非有基本人才不能負担固與普通大業畢業生甚多但被等所學不同非以鄉村社會為對象故習慣與鄉村生活殊多格格因此本院即注重此項基本人才久訓練俾將來真能深入鄉村對民眾用功夫教育民眾組織民眾使民眾自己發生力量如是而吾鄉村建設方著實際同時本院并擬實驗政教合一辦法政教兩

方面相輔進行力量自又不同也茲將以上意思開單述納為下點

1. 訓練鄉村教育人才即是訓練鄉村建設人才

2. 以教育為建設之基本著重在教育民眾組織民眾

3. 即培養民力使民眾自己發生力量能自動建設

原則參閱本院組織大綱第二條

1. 本院訓練人才目的既在建設鄉村故一切訓練均以鄉村社會為對象在鄉村社會農民生活中去找問題去沒法解決此中過程便是教學必如此教學方不落空訓練出人才亦才踏實也

2. 我國鄉村建設事業雖有定縣鄧平法粵南裕無錫等

关于改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提案(第2页)^①

^①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22-0001-00001。

處已著成績但彼等環境與四川不同其研究所得之材料
方淺僅足以供吾人之參考不能整個搬到四川故四川不言
鄉村建設則言表言鄉村建設似應先集中一區作研究是
驗的功夫俟研究是驗有得乃可言推廣也同時研究是驗
必有具體之事業吾人即在此具體之事業活動中去訓練
人才方有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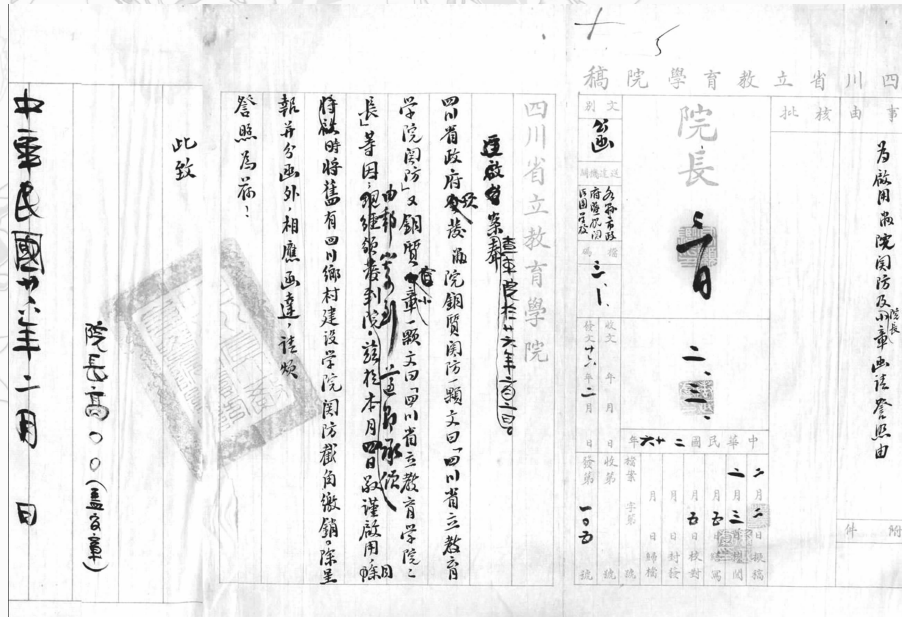
或謂現在我國各省一切政令推行均需要統一不容任
何地方假研究是驗之名致亂系統惟是推行中研究是驗
大有區別推行為極的發展為求速效起見故相當的需要
統一整齊至於研究是驗則是在深處用功夫勢不能不
予以相當自由然後研究是驗始有價值兩者是相輔為用
并不衝突况鄉村建設關係民族復興問題事業至為艱鉅

更必先經過研究是驗之階段也

3. 鄉村建設應是整個的不是零碎或片面的應以改進整
個社會生活為前提故當以「政」「教」「富」「衛」聯顧進行本院研究
是驗部之所以分教育生計衛生等課同時是驗區有區公
署者即是想將「政」「教」「富」「衛」四部分工作担負起來取
也參閱本院組織大綱第九第十四兩條

关于改組四川鄉村建設學院為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提案(第3頁)^①

^①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0122-0001-00001。



关于启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关防及院长小章的函^①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改组成立之初,只有乡村教育系和农事教育系两系,学制四年。院以下设总务部、教导部、研究实验部以及经费稽查、图书仪器设备、学生生活指导、军事训练、编辑、附设机关设计等委员会。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组织系统图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组织大纲^②

(编辑 郭兰)

①②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122-0001-00001。

北碚农学院的点点滴滴

□整理编辑/郭兰

一、筹建经过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下,全国人民都以冲天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的洪流中,为贯彻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各地红专大学与农业中学应运而生,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北碚农学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

1958年,为了进一步促进重庆市农业生产的跃进,满足农民对文化科学技术的需求,以及为各地创造的丰产经验提供一个总结交流的平台,在重庆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碚区委与中共西南农学院委员会开始酝酿筹建北碚农学院,培养农村专业技术干部和生产管理干部。

1958年8月3日,北碚区委张种玉、蔡定金同志及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李世俊院长到北碚夏坝原西南农学院校址了解情况并布置开学前的准备工作。8月4日,中共北碚区委和中共西南农学院委员会联名向重庆市委写了关于拟开办北碚农学院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为了促进市郊农业生产跃进的发展,在市委的意图和指示下,我们筹办的北碚农学院已大体就绪了,地点在北碚夏坝,西南农学院旧址。该处是暂借给四川省公安厅办理省干校使用,现省干校已经结束,拟将校址收回

使用。学院今后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北碚区委负责。市委已决定由张种玉同志兼任北碚农学院副院长;教学工作由西南农学院负责;计划调训及组织工作则请市农委、市农业局考虑;学院设备,家具等请市委指定由原省干校及政法干校全部拨用。”

1958年9月1日,北碚农学院正式开学了。

在市郊区农业生产大跃进声中 新型的北碚农学院诞生了

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都以冲天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工农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农业上的高额产量正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涌现,在这样的形势下,重庆市北碚农学院诞生了。这所新型的农学院是根据多快好省的原则,在市委直接领导下,筹建起来的。地址在夏坝(原西农旧址)。由北碚区委书记张种玉全志兼任院长。教学工作由西南农学院负责。学习由中共市委、市人委统一调训各乡社优秀干部。

北碚农学院的任务是为重庆市各区培养乡社的农业技术干部和生产管理干部,为农业大发展提供技术装备,以适应目前农村技术革命的需要。

北碚农学院是先采取短期轮训的方式,培养和训练各乡社优秀干部,分段学习,直至达到大学水平。其中共设五个专业:(1)大田作物专业;(2)果树蔬菜专业;(3)改土及土壤改良专业;(4)家畜饲养专业;(5)农业机械化学专业等。学习方式也是打破陈规地常规,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发挥学员的集体

的智慧,由学员自己提出生产上存在的問題,然后組織座談討論,典型經驗介紹,全時組織現場參觀,實習,實驗,并特約西農各系專業教師分別作專題報告等。每期學習的效果,使其能達到對總結和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上存在的關鍵性的問題,獲得一定的科學知識,并掌握先進的農業技術措施,以提高和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

北碚農學院第一期即將在八月中旬開學,目前籌備工作已大體就緒。

重慶市北碚農學院籌備工作組
58.8.5.

適應形勢發展 我院調整行政機構

本刊刊 根據學院具體情況,適應我校發展的要求,經黨委研究決定,我院行政機構作如下變動:

- 1.成立總務處,下設基本建設科、財務科、總務科、膳食科及衛生保健室;
- 2.撤銷科學研究部;成立科學研究生產部,下設科學研究科、勞動生產科和農場。

黨委這項決定已由李世俊全志于8月4日向全院師生員工宣布。

西南农学院报,1958年8月7日,第81期。^①

^①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cb12-28.0003。

二、办学情况

北碚农学院秉承“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以短期轮训方式进行,主要培养和训练各乡社领导、生产干部及专业干部,旨在为重庆市各区培养乡社的农业技术干部和生产管理干部,为农业大发展提供技术装备,以适应农村技术革命的需要。学院设有大田作物、果树蔬菜、家畜饲养、改土及土壤改良4个专业。学习方式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发挥学员的集体智慧,由学员自己提出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组织座谈讨论、典型经验介绍,同时组织现场参观、实习和实验,并特约西南农学院各系专业教师分别做专题报告等。每期的学习都希望能总结和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上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使学员们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并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以提高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南农学院抽派七名脱产教师常驻该院,即农学系文历伟、朱孝达、徐正华,植保系夏晖,土化系牟树森、夏培植,畜牧组杨世英,并配备车静明、赵子端两名职员。文历伟为总支书记,并分管教务。总务由朱孝达兼管,行政办公室由夏培植兼管,班主任工作由其余教师均兼。抽调去的教师党组织关系也转到北碚区委。除此之外,学院还另派一部分教师去兼授有关课程,如农学系张家付、王运正,园艺系章瑞华、曾淑冰,土化系青长乐、周则芳,畜牧组李家洁等。

学院前后共举办了三期培训。第一期培训时间为1958年9月1日至10月15日,开设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大田作物,招收学员120名,另一个是改土及土壤改良,招收学员60名。学员都是乡、社干部如社长、副社长、生产队长等,具有高小毕业或初中文化水平。90%以上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其余非党(团)员都

是积极分子。两个专业的学员中,除两名学员成绩不及格外,其他学员成绩均属良好,其中12名受到表扬。对此,学员们很满意。第一期的培训效果总体上很好,学院在总结经验时指出,这些成绩一方面是北碚区委、西南农学院党委及主要负责同志李世俊院长亲自深入领导,政治挂帅,严格贯彻市委“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和“厚今薄古”教育方针的指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与教师们努力钻研辛勤教学和学员们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在第一期取得良好效果后,第二期培训在同年11月15日开始,1959年1月15日结束,历时两个月。在第二期的培训中,学院共开设了大田作物、蔬菜、家畜饲养三个专业,招收学员200人,其中江北区30人,南岸区30人,九龙坡区30人,北碚区35人,沙坪坝区35人,南桐区40人。这批学员仍然是乡、社领导、生产干部及专业干部,选拔的条件有三,



祝北碚农学院的诞生

重庆市北碚农学院已于9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4日正式上课了。

这所新型的农学院是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中筹建起来的。要实现技术革命,必须全时进行文化革命,大力发展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教育事业。几个月来,农业生产战线上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史无前例的高产丰产已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广大的劳动农民对文化科学技术的要求已愈加迫切了;全时,各地创造的丰产经验也亟待进行总结交流,重庆市北碚农学院的主要任务也就在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的巨流中,本市教育事业也获得巨大的发展,贯彻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近来各区的红专大学与农业中学犹如星罗棋布,对农业生产已起了一定的作用,北碚农学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筹建起来的。

办学必须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北碚农学院正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它将为本市培养出大批农民出身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劳动者。

办社会主义的一切事业,必须发扬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所农学院的成立,是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由西南农学院积极主动的协助北碚区委进行了一切筹建工作;今后的教学任务也将全部由西南农学院承担,这种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西南农学院还将通过它总结经验,今后为本省各专区筹办更多的学校,全时也使西南农学院的教学更好的结合生产,结合实际;今后必将使西南农学院的教学质量大大提高一步。

最后,我们预祝这所新型的农学院,对促进市郊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西南农学院报,1958年9月14日,第85期。^①

^①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cb12-32.0012。

即思想进步;身体健康、无传染病、能坚持学习;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

因前两期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各方面的能力都有所加强,第三期培训的时间也逐步延长,变为了三个半月,即从1959年2月开始至6月中旬止。开设有大田作物、改土及土壤改良、果树蔬菜、家畜饲养四个专业,学员约为200人。第三期培训工作结束后,西南农学院常驻夏坝的七位教师中朱孝达、夏培桢、杨世英三人回学院本系组,文历伟、徐正华、夏晖、牟树森参加了由市委辛易之、肖泽宽、李止舟同志组织的农村调查组工作,并于9月底全部返回学院。

三、停办缘由

北碚农学院举办三期培训之后,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其师资主要依靠西南农学院,而西南农学院本身也面临师资紧缺的问题。鉴于师生下放劳动锻炼结束,需要返校行课的实际情况,西南农学院于1959年6月向重庆市委请示停办北碚农学院,在请示中指出:

“1958年在市委、市农委领导下,在我院夏坝旧址,成立了北碚农学院,由北碚区委直接领导,我院在教学上协助。一年来先后举办大田作物、改土及土壤改良、果树蔬菜、家畜饲养等四个专业的三期短期培训班,培训了乡、社领导和有关管理生产的干部,共计580余名。1958年秋季以来在下放阶段,我院一千多名师生下放到人民公社,为了保证北碚农学院如期开学,学院抽调了七位教师,脱产常驻北碚农学院担任行政和教学工作。与此同时,还抽调了七八位教师兼任该学院部分教学任务。现在下放校外师生陆续从下放基点返回学院,开学行课,由于目前教学任务紧,下学年招收任务重,而且新成立了畜牧专业,为了集中力量办好我院,这七位教师不可能长期脱产,留驻北碚农学院。这样北碚农学院怎样办理呢?我们初步意见:

1、如果是短期培训,在我院可能情况下,可考虑由有关专业担负培训任务,如我院植保专业曾为市区培训过抗生菌学习人员;园艺系专业曾为省农业厅培训过果树蔬菜学习人员;现在土壤农化专业受农业厅委托,又举办了培训一年的土肥科。

2、如果北碚农学院继续办下去,建议由市农业局和北碚区委配备专职干部。其中至少须有处长级以上负责干部一人。在教学上我们尽可能派有关教师前往兼课,原有七位脱产教师,全部返回学院原单位工作。”

重庆市委考虑到西南农学院的实际情况,同意停办北碚农学院。

四、后续工作

北碚农学院停办后,1960年4月1日,中共重庆市农业局党组张若千同志向市委写报告,谈及北碚农学院的善后工作。报告说:“根据市委指示,应以北碚农学院为基础,适当进行调整,进一步加强领导骨干,创建农业干部培养训练的学校一所,有计划地抽调市郊各区、县人民公社管区以上干部学习农业科学技术,为本市农村建立一支坚强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学校名称初步拟定为重庆市农业干部学校或者重庆市农业红专学院。建议由市委农工部领导,教学由西南农学院包干负责,行政管理由市农业局负责。设备与经费:拟利用北碚夏坝北碚农学院校址建校,房屋由西南农学院划拨,修缮加固后使用。”

1960年4月22日,市委农工部又向市委递交了报告。报告中指出:“经与组织部共同研究,同意成立重庆市农业技术干部学校,由市委农工部领导,西南农学院负责教学,市农业局负责行政管理,教学人员由西南农学院负责组织,并调派专职教务人员。学校严格贯彻‘以农业八字宪法为纲,系统地总结生产经验与农业科学知识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与专业培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习相结合,为当前生产大跃进和实现农业四化服务’的教学方针。从当前生产需要出发,进行重点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的讲授,并开设一定的政治理论课,政治课约占整个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一左右。学校的调训对象以生产大队的技术人员为主,结合训练公社和管区一级技术人员。学制暂定为每学期三个月的普通技术教育。”

重庆市农业技术干部学校第一期于1960年6月开学,9月4日结束,招收公社、管区干部250人脱产学习普通农业技术,未分专业。在学习中,学员们热情很高,(下转第24页)

至乐桃林沾化雨 佳作偏映夕阳红

——从一支铅笔引领我进入艺术殿堂的郭克先生

□文/方凤富

云霞成异色,松柏有奇姿。今年11月23日,是我尊敬的老师郭克先生九秩大寿(周岁89,虚岁90)。在“彩笔莫道随老去,人如松柏岁长春”的美好时刻,我不由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起,在风景如画的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读书和工作时的一件件往事。

两片赤脚进学府 一支铅笔拜恩师

1956年初夏,我作为忠县三汇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名穷学生,由学校推荐,身带4元钱与3位同学艰难步行2天1夜,赶到四川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参加高考,最后被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5年制专科)录取。

我打着赤脚来到西南师范学院,在音乐系上了1年的基础课之后,由于发音声带病变,唱歌变声,不能继续学习声乐。后经申请,系领导批准,我于1957年暑假开学后转入美术系56级插班就读。那时,班上的同学都上了1年的基础课,有较好的美术基础。而我只是一个爱好美术的插班生,比起班上其他同学来说,基础是最差的,专业素养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1957年9月,开学后,我怀着忐忑之心跨入美术系教室,上的第一堂美术专业课就是郭克先生讲授的素描。如今57年过去了,春风梳柳,时雨润苗,那一幕幕往事依旧让我记忆犹新,且充满感激。

第一堂素描课,我连拿铅笔和运笔这些最简单的方法都不会,是郭克先生耐心仔细

地手把手教我用铅笔画素描的方法、步骤。用他的心温暖我的手,让爱传递知识。应该说:郭克先生是用一支铅笔引领我进入艺术殿堂的第一人。先生当年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的绘画艺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定当铭记弘扬。

目睹严师出高徒 寒来暑往识真金

我与郭克先生相识已快60年了。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美术系决定让我从行政转入教学。那时,我和郭克先生同在花鸟画教研室工作,他曾任教研室主任,对我从事花鸟画教学多有指导和帮助。因此,我对其工作、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及之后提前毕业留校,为了节约路费,我曾5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我利用寒暑假在学校勤工俭学,同时补习功课为自己充电。那时,我亲眼目睹郭克先生在酷暑难熬的夏季光



美术系郭克教授在指导学生写生^①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6-SX123-1.0026。

着膀子画画。后来,我还有幸得见先生在“文革”时期画毛主席肖像的情景。

在教学上,郭克先生极为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示范作画,一丝不苟。他所画素描和范画,一笔一画,从不马虎。不仅要求学生做到,就连青年教师(其中就包括我)也都是严格要求,尤其对青年教师上课使用的范画,每一幅、每一帧他都要过目审阅,通过后才能拿上讲台。系上的同志们都知道,郭克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绘画艺术精益求精。若不严谨,马虎敷衍,则严厉批评,严格要求——但又具体指正,细心引导,讲真话,诲人不倦。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短缺,供应十分紧张。当时,郭克先生在系上兼任工会主席,为了照顾老教师,他多方设法在发放物品时给予倾斜。我当时刚留校,在美术系当保管员,有幸亲眼目睹这一件件、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往事。比如在分配香烟时,郭克先生虽然烟瘾很大,但他却从不伸手,宁愿自己不抽或少抽,也要发给烟瘾大的老教授、老教师。不过,那时每人每周也只能发放10余支香烟。

1984—1985年,郭克先生数次带领学生去贵州遵义、铜仁、四坪等地写生,搜集创作素材。不管酷暑或严寒,他始终坚持白天画画,晚上看学生画稿,并进行详细讲解、点评,经常劳累工作至深夜。那时,外出写生非常艰苦,困难很多,但是先生从不搞特殊、讲排场。一碗面条、两个馒头、一碟咸菜、一碗菜汤就能过上一天。没有床铺就与学生挤在一起睡地铺也是经常之事。师生融为一体,情深深,意浓浓,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莺歌燕舞绘花鸟 画中有诗抒豪情

郭克先生擅长中国花鸟画,早年曾画素描和油画,兼习中国画,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绘画功力。其画十分讲究用笔、用墨和用色,尤其重视诗书画的全面修养。在创作中,逐一深究,以求意境的深远,并力求达到情和景的统一、诗和画的统一。其作品能融中西绘画之长于笔端,严谨朴实,

予精巧雅情于一体,画风清新细腻,富有生活气息。

郭克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创作生涯中,辛勤耕耘,乐育英才,创作了不少精美之作。尤其是描绘、反映春暖花开、百花争妍以及莺歌燕舞的绘画作品,不但数量多,而且丰富多彩。从这些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丽祖国的讴歌。

读他的画,不难发现春天这一美好的主题,是他80年代后常表现的题材。春天,为诗人和画家展现了广阔的视野和创作的感悟与激情。《春声》《迎春曲》《玉树迎春》《春燕》——都是描绘、赞美春天的,呈献的也是一片盎然春意。郭克先生爱春天,也爱春天的紫藤、牡丹、樱花、杜鹃,更爱春天的玉兰。因此,每逢春季,他都带领学生去成渝两地公园、植物园及金佛山、黄山和北泉公园等地观赏玉兰花卉,并作采



迎春曲^①

^①图片来源: http://pzjs.le111.comartbasebig_chaoshi.aspx?id=6572。

校史校情

风写生，搜集创作素材。他的许多作品都与春花结缘。诗人墨客是用敏锐的观察力来描写春之美景，畅怀抒情。而画家则以诗的情韵，对眼前春天明媚景物的感悟，来捕捉景物。

《迎春曲》是郭克先生为迎接新世纪而倾情创作的一幅作品。此图三易其稿，作者连续画了四次才最后完成。该作品以写实、写意突出表现画中下端红艳凝香的花中之王牡丹的风姿。牡丹是富贵吉祥的象征，它寓意新千年祖国大地更加欣欣向荣，灿烂辉煌。画图中部的山石上栖鸣欲飞的四只形态各异的白头乌，惹人喜爱，使画面显得生机盎然，生动活泼，传递了春天的信息。

《琼枝吐艳》即是一幅反映春意题材的国画佳作，郭克先生在创作时，巧妙构思，精心构图。以写实的手法突出表现了白色的玉兰和黑色的八哥，用浅黄色的宣纸作底，从而构成了画面主体色彩的强烈对比，互为衬托。静中的玉兰，洁白无瑕，它虽无香气袭人，却有花容俏姿、玉冠出众、丹心微露、素雅夺目之感。它质洁花发，不饰红粉，不以艳色取宠于众。在其枝头栖鸣欲飞的两只八哥，又形成了静与动、有声与无声的强烈对比与和谐相融之情调。在艺术手法上，用小写意笔法在主体的背景上绘以淡淡的绿竹，既衬托出主体，又开阔了视野，更加深了空间深度，丰富了色彩的互补性，使画面上的玉兰、八哥、幽竹形成了高雅脱俗的初春境况，给观者以心旷神怡之感，并呈现出一派明媚春光的美丽景色。他不止是在

画画，更是在画诗，正如诗评家吕进教授所言：“他是绘画领域的抒情诗人。”

耄耋老人赠画稿 一片丹心留后人

郭克从20岁入渝，在山城学习、工作、生活了近70年。郭克先生倾毕生精力致力于中西绘画教学。20世纪70年代末，从西画转向，侧重中国花鸟画的教学、创作和研究。在其教学、创作生涯中，桃李芬芳，硕果丰盈。其国画佳作《迎春曲》《日出山花烂漫》分别被中国美术馆和毛主席纪念堂收藏。此外，他还出版了多本画集。

2012年7月，87岁高龄的郭克先生将其60余年艺术生涯创作160幅书画作品，分别捐赠西南大学和天水市博物馆，其义举和价值取向令人钦佩。此次捐赠的160幅书画精品力作，涵盖了他60多年创作历程，作品中有素描、水粉画、中国画和书法等精品佳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作为一名艺术家，郭克不仅创作了很多作品装点人们的生活，而且还以捐赠的方式将个人创作的艺术之美变为社会的一种公共财富，并希望以这种方式报答学校。

心地坦荡宜福寿，精神爽朗自康宁。祝郭克先生人歌上寿，天与遐龄。

(编辑 刘润)

自幼爱艺,终身受益

——记郭克先生的美术创作人生

□文/周凤

一

郭克原名郭克宽,字渭川,于1925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初七)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新阳乡赵家村的一户普通人家。据郭克先生回忆,自20世纪50年代后,出于作画署名简易化需要,很早就将名字末尾的“宽”字去掉,以郭克自居。

郭克先生少时丧母,加上家境贫寒,过早体会到了时事多艰,家庭条件的不利使他从小就在心中埋下了发奋求学的种子。进入正式学校学习之前,郭克先生在初通文墨的父亲和读过私塾的爷爷指导下断文习字,并在家中自学《三字经》《百家姓》等经典读物。6岁时,郭克先生进入家乡王家庄初小学习。在读初小的时候,他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起初由于条件有限,他一般以身边事物作为绘画素材,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花窗。其后经过一年的补习班学习,郭克先生顺利进入家乡高小学习。在高小学习期间,学校开设了正式的美术课,郭克先生就开始跟着美术老师学习绘画,逐步由最初的模仿老师作画到后来的自主创作,在美术上的造诣不断提升。

1938年,郭克小学毕业,因家资菲薄,生活困难,面临无力继续升学读书的困境,幸而一所无需缴纳学费的学校——天水师范学校接纳了他。在水师范上学期间,日本对华侵略步步深入。郭克主动加入学校“师范美术编绘”的制作,主要负责创作一些“打鬼子”的情景画并附上相应的抗日口号。在当时该编绘大概一个月出版一期,制作完成后就张贴在学校各个公示栏处。

1942年毕业后,郭克先生就留在了天水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担任美术老师,前前后后共任教5年。期

间,郭克先生于1944年考入甘肃省立师范学校高师深造。1943年,郭克先生在家乡新阳镇举办了首次画展,当时参加展出的作品多为他在天水师范学校创作的,也有部分抗日绘编时期的作品。后来,他又因家庭经济拮据,不得不辍学回乡,而后又继续在天水师范附小任教,直至1947年初。

1946年,郭克先生与张世禄、孟时规、周兆吉在天水举办四人画展,这次的画展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超过1943年郭克先生在家乡新阳镇举办的首次画展,在当地引起轰动。

怀着对美术的崇高追求,郭克先生于1947年初返回甘肃省立师范学校高师复读,在继续深造绘画的学习与研究中,因其突出表现和优异成绩,被甘肃省教育厅保送到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从此确立了自己人生的职业走向。

二

1947年10月1日,郭克从家乡新阳镇出发,经天水、越秦岭,颠簸两千余里,于10月8日到达具有浓郁豪迈之气的重庆,就读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国画专业继续探索艺术之道。当时郭克先生还享受免学费的奖励,但生活费仍需自己承担。幸运的是郭克先生结识了美术老师方山子,受其每月两块银元接济,基本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他跟随方山子老师学习时用功甚勤,技艺精进。

1950年,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郭克先生被同学推选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重庆美专学习期间,他有幸结识了留法归国的美术艺术家张宗禹,在与张宗禹研究探讨绘画技艺与艺术魅力等问题的过程中,他开始思考国画与西画之间的异同,将中西绘画

校史校情

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吸收中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对两种不同艺术领域的探寻,使他的绘画造诣具有中西兼修的特点,为他的艺术添增了丰厚与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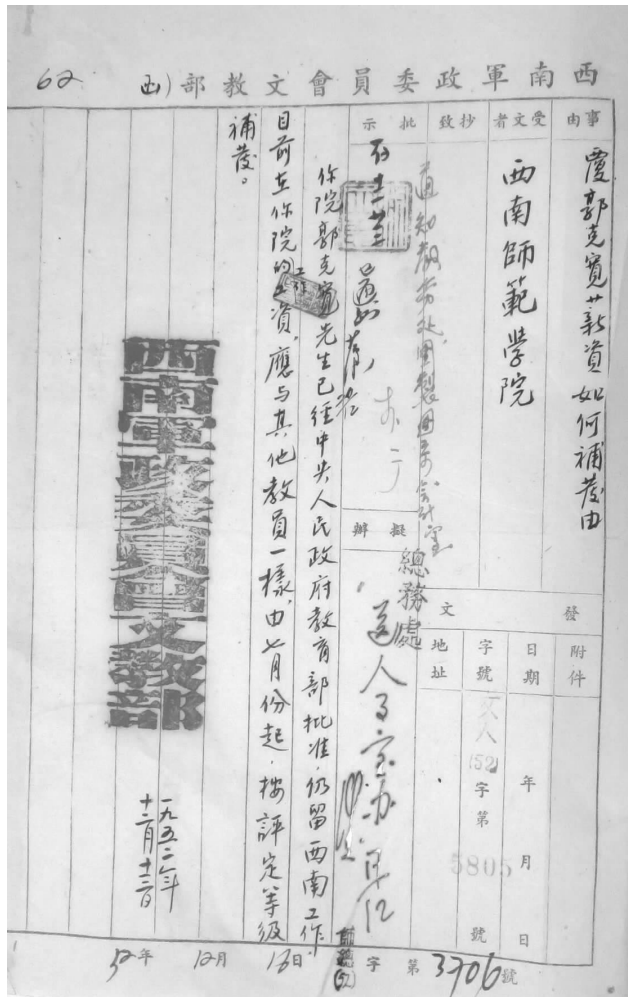
此外,郭克先生还与同学孙美玉等人联合开办画刊,主要用于同学之间对绘画艺术的相互传阅、鉴赏,当时他们创办的画刊无固定刊期,画刊作品大多来自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每期一般收集5~10幅美术作品。

1950年秋,郭克先生从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为响应当时国家教育局大兴支教的号召,郭克先生于同年9月应东北招聘团邀请,到吉林长春市女子中学任美术教师。郭克先生自幼在甘肃生长,此后又在重庆生活,实在不能适应东北地区的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据郭克先生回忆,他在吉林长春市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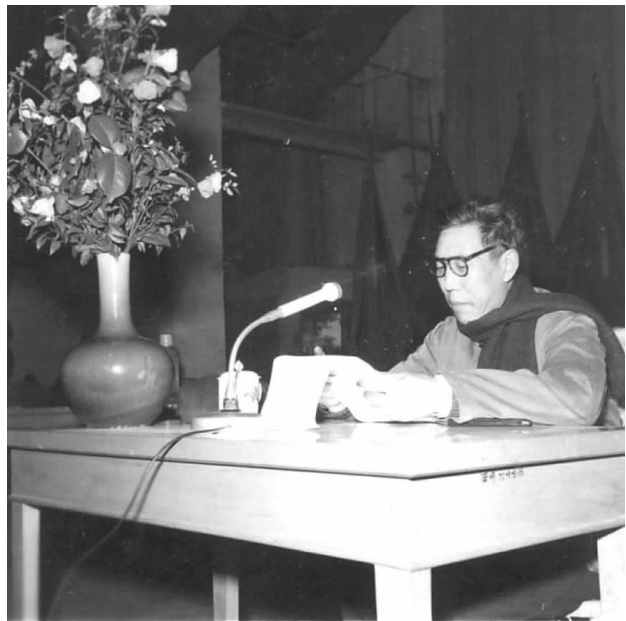
子中学任教期间,正值严寒的冬季,只能以睡大炕取暖;除此之外,由于生活条件有限,当时只准许每周一、三、五吃米饭,其余时间只能靠吃玉米渣来填饱肚子。同时,主观上他很想回到重庆美专继续学习深造。于是郭克先生于1951年初写信给张宗禹,表明了自己想回来继续学习的想法。此时,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已合并到新组建的西南师范学院,张宗禹担任美术系主任。张宗禹收到来信后回函:“希望你来西师美术系作助教……”。起初,吉林省长春市教育局局长和其所任教学学校的校长说什么都不放他回来。无奈之下,郭克先生只得选择违反规定,于同年10月,辞别了吉林长春市女子中学,乘火车到武汉,顺长江而上回到重庆。由于违反规定,郭克在吉林长春市女子中学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据他回忆,当时因为没有收入,连剪头发的费用都负担不起,只得留长发。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郭克先生留西南工作。

三

自1951年10月起,郭克先生就开始在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一边学习一边担任助教。正是在这里,



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回复郭克宽薪资如何补发的函^①



先进工作者郭克在大会发言^②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51-XZ11-43.

^②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78-SX122-1.0009.

郭克先生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一步一步从一名默默无闻的青年教师成长为著名的国画艺术家,其间于1978年9月30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克先生大多数的经典国画艺术作品都是在西南师范学院期间创作的。好的艺术品是以创作者深入实地感受、感知、感化为基础而成的。1958年,郭克先生被下放到团山堡劳动锻炼,参与创作《劳动锻炼诗画册》。第二年,《劳动锻炼诗画册》出版。1963年,郭克先生先后去贵州扁担山、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前后历时数十天。在西双版纳期间,正逢当地自治州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所获得的创作素材更加丰富。同年,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了郭克、张世禄、孟时规、周兆吉等“四人美术作品展”。1965年,郭克与刘一层教授合作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川西三月》、连环画《重新作人》《赔了老本》《蹦蹦跳跳的小皮球》以及其独自创作的《刘文学》等,先后由西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举国上下的教学、创作活动相继被迫中断,郭克先生仍坚持创作。10年文革期间,郭克先生为部队、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等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60余幅。特别是在1970年的冬天,郭克为松藻煤矿绘制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像高21米,历时半月完成,为其一生绘制的最大作品。1973年,由郭克先生创作的国画《孔雀》参加四川美展,获得了一致好评。

郭克先生创作的素材因其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而日益丰富,其作品影响力也日益增大。1982年,郭克先生创作的《花垂明珠滴香露》远赴非洲、美洲巡回展出;1984年,其创作的《迎春曲》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85年,郭克先生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86年,其创作的《鸟语花香》远赴美国参加《现代中国画展》。经过岁月的洗礼与积淀,无论是郭克先生本人还是其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更具风韵。1988年,已经63岁的郭克先生为驻德国大使馆创作《牵牛》花鸟画立轴;其作品集《郭克花鸟画集》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出山花红烂漫》被毛主席纪念堂珍

藏;同年重庆国画院赴北京中国美术馆展览,郭克负责陪同方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参观,并且参加了北京第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

1989年,郭克先生担任重庆国画院常务副院长,在职6年;1992年,作品《尧天硕果》被毛主席纪念馆珍藏;同年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职称评审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68岁的郭克先生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三等奖”,这一切都是他的人生修养、学识修养、艺术修养整合集成的必然结果。

四

郭克先生倾尽毕生精力刻苦钻研国画艺术,其所创作的众多艺术作品便是他艺术人生的缩影。郭克先生早年曾师从张振铎、庄子曼、刘一层等教授,并对任伯年等先辈画作进行过精深的临习研究。

画家有文学修养才会意涵有韵,画家懂书法艺术才会有婉转生姿的笔法和机动调度的气性。郭克先生不仅拥有素描、油画等方面的艺术才能,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诗词、书法艺术等领域也多有建树。他早年习王字,后习文征明、赵、柳字,悉心体会,得其精要,尤擅长行书。他自幼熟读《芥子园画谱》《唐诗三百首》,而且还喜欢读新诗。这些画外功夫为他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艺术视野开阔,异花奇叶,草木虫鱼,秋花春鸟,尽收笔底。郭克先生尤以花鸟



郭克教授在创作^①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6-SX123-1.0028。

校史校情

画名世,他的花鸟画注重笔墨韵味,画风清闲细腻,赋色鲜亮明丽,形象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2009年,学校授予郭克先生“新中国成立60年突出贡献奖”。

好的艺术作品,不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分享。2012年,郭克先生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100幅,用于师生们借鉴与学习。学校隆重举行“郭克教授书画作品捐赠仪式”,校长张卫国教授代表学校向郭克教授表达谢忱;同年,郭克先生向家乡天水市捐赠书画作品60余幅。郭克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敬佩,他慷慨地将其艺术作品赠予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后人对他的怀念与敬仰,更多的是完成中国绘画事业的一种延续、交接和传承。

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与艺术相结合已经是一个突破,若是还能将人生与艺术相互融合则堪称

经典,郭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作为教授,他敢于负责任,积极用心传道解惑育英才;作为艺术家,他总是在反道中新生。他的一生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他一生都在为追寻更好的绘画灵感和素材而努力。他总是强调中国画是一种文化,每一次创作都力争是丰富中华艺术文化的行为。他永不停歇地创造出具有“新意”和“厚重”内涵的作品以润泽人类的心灵。正是有了像他这样务实、勇于追求卓越的老一辈艺术家们,我国的艺术事业才有现当代蒸蒸日上的发展。

(本文根据郭克先生的口述资料整理而成,采访者为杨程程。)

(编辑 蒋云燕)

(上接第17页)极大地提高了对农业技术知识的认识,都非常满意。1960年9月17日,市委农工部发出通知,继续开办短期训练班。第二期的培训班决定培训200人,分设粮食作物、经营管理、果树、畜牧兽医四个专业。粮食作物、经营管理两个专业培训2至3月;果树、畜牧兽医两专业培训3至4月,要求前两专业选送生产队长、公社干事、支部书记、管区正、副主任;后两专业选送青年社员和农业中学学生,并决定学员们在9月29日至30日报到,10月1日开学,学员名额按区分配人数为:江北区7人、南岸区7人、九龙坡区14人、沙坪坝区9人、北碚区20人、南桐区20人、巴县50人、綦江县37人、长寿县36人,共计200人。

1960年年底,在举办了五期短期培训后,重庆市农业技术干部学校决定停办,其先后培训农业干

部970余人,为重庆市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农业建设人才。

参考文献:

- [1] 校史资料(021-037),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 [2] 在市郊区农业生产大跃进声中,新型的北碚农学院诞生了。西南农学院报,1958年8月7日,第81期。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cb12-28.0003。
- [3] 祝北碚农学院的诞生,西南农学院报,1958年9月14日,第85期。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cb12-32.0012。

(编辑 刘润)

记忆中的董时进

□文/封期平

编者按：董时进(1900-1984)，四川省垫江县(现重庆垫江)人。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1920年董时进通过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的考试并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4年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回国，担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创办重庆大新农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中国农民党。1951年定居美国。在美国除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外，还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在美国去世。他去世后，子女遵照他的遗愿，将政府发还他的井口农场全部款项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为纪念这位老人一辈子爱国爱农的心愿，西南农学院于1987年特设立了“董时进博士农业科学奖学金优秀论文奖”。董时进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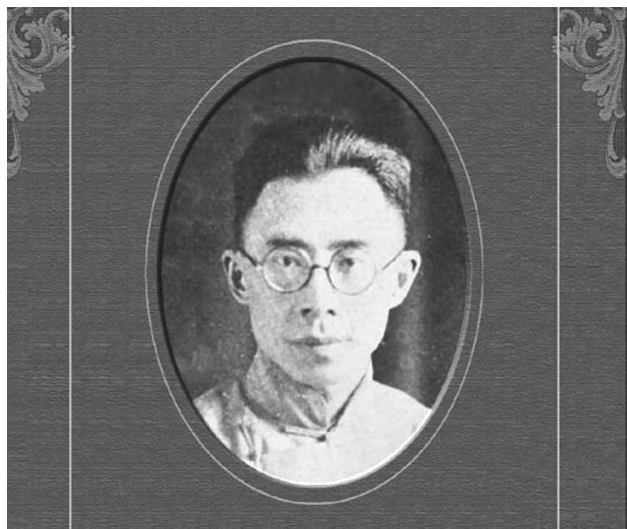
董时进是我父亲封昌远的老师，小时候我经常听父亲提起他。父亲自1937年国立北平大学毕业后至1950年董时进赴美前，其事业都与这位老师分不开。他们一起在四川农业改进所工作，一起建农民党，一起办《现代农民》，一起踢足球。今年是董时进博士逝世30周年，也是他诞辰114周年，特写下此文纪念他。

—

我在家中排行老五，是家中唯一没见过董时进的孩子。小时候我每次坐公交车到市区大姨家去，路过井口农场时，父亲都要指着那绿荫蔽日的果树，对我说这农场里的每一棵果树，都是他的老师董时进先生当年与工人一起开荒种植的。

那时候每次从北碚坐公共汽车到市区去，一般都要半天甚至整整一天的时间。进一趟城真的是很辛苦，公路是土路，车一路颠簸，抖得人都快散架了。可是快到井口时，公路左边贫瘠干旱的山坡，渐渐变成了绿色。随着车开近，就会看见柑橘树一株接一株的，像撑开了一把把绿色的巨伞，将荒坡变成了真正的花果山。这个果园最特别之处是它的围墙是一种浑身长

满刺几乎看不见叶子的灌木——枳实树环绕成的。看见这片果园，就能想象到当初开辟、创建它的人是何等的热爱自然，重视农业生态平衡，重视科学种植。而公路右边则是一湾清澈的溪流，溪流边有葱茏的竹子、农田。车行至此，空气顿时清新滋润了不少。由于这段路有这片果园调节，防止了水土流失，路况也好了不少。每次车到井口，父亲都要望着窗外的美景对我说：“这片柑橘树还有柠檬树所在的地方，就是董时进办的井口农场。当年董老师来到重庆，为支持抗战和科学实验，创办了这个农场和《现代农民》杂志，并在它们身上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不但花光了他自己多年的积蓄，连他们家族的钱也投了进来。董老师为了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解决地少人多的问题，倡导发展农业经济，种植水果、花卉、烟草、茶叶、甘蔗、棉花、蓖麻、人参、薄荷、除虫菊等价值高的经济作物，而这些作物几乎都在井口农场种植成功。”那时父亲说到他的老师董时进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井口农场的事：农场生产的水果很多，有苹果、柚子、柑橘、梨、桃、枇杷、葡萄、柠檬，这些水果的供应大大的丰富了抗战时期陪都人民的生活，农场每年的柠檬除了供应重庆市场还要用飞机运到上海去卖。



董时进^①

二

1934年,董时进任江西农业院院长。原来该院每周一都要举行“纪念周”活动,就是全体人员集合在大礼堂或操场升旗,念“总理遗嘱”,唱“国歌”,听领导训话或讲话。董时进刚上任就决定停止此活动。

1938年,董时进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同年,他在成都创办了“现代农民社”,并自筹经费创办《现代农民》月刊,亲自担任主编,我父亲任副主编。《现代农民》在发刊词中宣称:一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二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四部分。在农业科技部分刊登的《四川的柑橘事业》《柚子的希望》《广西沙田柚》《巴县橘子》等文章影响深远。董时进本人也以“退思”的笔名写了多篇《农人日记》在该杂志发表,如实反映了当时农民受压迫的实况和悲惨生活。此外,他还主张多喝牛奶来增强国民体质和智力,并广泛介绍了西瓜栽培、白木耳培养、红甘蔗和核桃树种植,以及猪、牛、羊、鱼养殖等科学技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对发展四川的农林牧副渔业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时进在那段时间特别辛苦,每天往返于郊区与市区之间,但精力却特别充沛。1945年4月,董时进在城里编辑部看完稿子,乘公共汽车回农场,不幸

遭遇车祸,汽车在土湾附近翻下坡,他的三根肋骨折断了。虽然身负重伤,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伤一好,他又继续往来于城乡之间,办农场、编杂志、建农民党,关心农民的疾苦。

杂志社迁到重庆后,先是设在市中区米花街,由于遭到日机轰炸不得已迁到枣子岚垭、红球坝等地。该社三次遭炸三次迁址,多次毁板毁稿,却一直坚持到1949年,其间从未间断。听我七哥(堂哥)说,他看到《现代农民》时,已读小学四年级。那时每次他与他父亲(我的四伯伯)进城时都要到米花街、红球坝、枣子岚垭的社址去,去看我父亲,大人们喝茶、歇脚、摆龙门阵,他就去看《现代农民》杂志。七哥说他当时作为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也觉得该杂志很好看,《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简直就像在讲他身边的事。另外董时进亲自写的那篇《请政府禁呼万岁》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写道:“万岁爷骑着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佣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一些老祖宗。”这类文章就像给他开了一扇窗,让他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开阔了眼界,养成了不随波逐流,遇事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年龄增长,他又对那些《梁山柚子》《牛乳与中华民族》等文章很感兴趣了。总之,《现代农民》正好在他世界观形成,知识增长时期伴着他成长。

三

董时进通过长期社会考察和亲自办农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农村土地经济和社会分析一直有独到的看法。

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民盟政纲。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他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并在会后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将退出民盟。

1946年旧政协会议时期,董时进联络农业协进会中的一部分人在重庆筹备农民党,发展的党员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我父亲也在其中,后

^①图片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527436.htm>。

来还任农民党的秘书长。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后,组党相对自由宽松,各派系纷纷成立自己的党派。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经过长期筹备后,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农民党,并当选为主席。该党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反对强制没收农民财产”“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注重乡村与城市的教育平衡”等主张。董时进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钱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1948年5月农民党召开了三中全会,会上修订的政治纲领有四项:一、建立民主政治;二、促进经济发展;三、合理分配财富;四、消除一切战争。从农民党这次修订的政治纲领来看,他们还是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的。

1949年4月,董时进为谋求农民党成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派人到北京找周总理面谈。周总理派李维汉在当年6月约见董时进,李维汉批评他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是力图为地主阶级保存封建剥削制度,批评农民党是地主党。同年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中国(世界)第一个农民的党,仅仅生存了两年就寿终正寝了。农民党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修明法纪、惩处贪官,另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土改政策,这种夹缝中的奋斗,必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排挤。农民党的口号是“主张改良、反对暴力”,强烈反对内战,直接挑战国共两党。尽管它一再声明严守中立,“绝没有和任何党争江山的野心”。可是这点愿望无法左右当时的政局,当然也不可能实现。

四

董时进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无私无畏,有胆有识,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弊端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宁愿不当官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共产党也同样是这样,有什么看法就大声地说出来。他对共产党起初是很有好感也很支持的,曾撰文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实事,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官场恶习”,尤其赞扬陕甘宁边区

的“三三制”政权好。抗日战争时期,董时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算融洽,与常驻重庆的董必武、郭沫若等人也多有往来。只是从解放战争时期起,董时进对解放区土地改革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而他又不是个人云亦云的人,习惯大声说出来,这就改变了原本还算融洽的关系。

1949年12月,董时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牵牵大端、洋洋万言的《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在文中,他分析列举了将土地简单地平分给农民后,会给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劳动力转移出去。而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去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董时进还认为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董时进直到这时还是对共产党充满希望,希望他的意见会被采纳接受。但他这封信最终没被毛泽东采纳。董时进直到去世都不愿意相信他的这封将土改利弊罗列得够清楚的信,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看了会不接受。所以董时进一直说:“刚好把致毛泽东的信交邮之后,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已抵莫斯科的消息。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已成明日黄花的旧函。”毛泽东是否看到了这封信至今还是一个谜。

到1950年初,他上书一事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反而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甚至有人说他是有私心。其实他完全知道,他在井口农场的土地按土改的政策根本不在没收范围,他也不会被划为被专政的地主分子,他的“成分”最多划为在政策上受保护的资本家。这点他在《董时进上毛主席书》中也提到过,他当时上书的动机完全是忧国忧民。但最令他难受的是,以前的那些对中国政局和发展很有自己独到看法的人也对他不理解,甚至攻击。他对中国农民的前景深感绝望,甚至悲哀地预言:政权巩固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

校史校情

政府,最后会出现很多问题,会饿死人……但是最后他又乐观地预言:“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反证了董时进的某些先见之明。董时进是一个真正为中国繁荣富强而辛勤工作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早期真正的农业问题专家。在走了一些弯路后,有好几项农业发展都走上了他当初建议和主张的道路。董时进在关于农业、民生、经济问题的大是大非上,能够做到高瞻远瞩。但对于政治,有人说他显得天真,他反对内战,建议国共两党都裁去军队,只保留警察,认为没有军队,就打不起来了。美国人魏德迈曾写信给他:“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劝他“跟蒋先生走”,自有“出路”。但他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理解共产党,他就是——一个凭自己良心说话的学者。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天真,还不如说他太怜悯在八年抗战中默默奉献的人民,尤其是农民。或者说,他太希望和平了。

董时进于1950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依旧继续关心中国政治与农村问题,在香港写了三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中旅行的笔录。此笔录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既有生活现象,也有对社会心态的转变等问题的观察,而他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和犀利的,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五

董时进一家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于1951年夏季到了美国。到美国后,董时进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并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在美国、

加拿大各大城市和社团、大学演讲不下300次。他在垂暮之年曾于1979年、1981年、1983年三次回祖国探亲访友。而且还不顾旅途劳顿,连续写了《大陆之行》《重返大陆》《再去大陆》在《美洲华侨日报》登出。

董时进1979年第一次回国,只到了北京和重庆两个城市。董时进在北京时游览了故宫、长城、十三陵等地,探望了旧友陆定一先生。好友故旧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华侨大厦探望,畅叙旧谊往事。然后他飞往重庆,参观了重庆大学、南开中学校址,游览

17

MEMORANDUM

To: Minister,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PRC
President, the Southwest Agriculture College, Chongqing, Sichuan
Mr. Hu Zi'ang,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Beijing

From: Constantine Tung (董保中)^{CT}, Vera Tung Preston (董保和)^{VP}
Paul Tung (董保哦)^{PT} and May Tung (董保喏)^{MT}

Re: The use of the monetary compensation to Dr. Shih-tsin Tung (董时进) relating to his farm in Jingkou (井口), Chongqing, Sichuan fo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Date: May 4, 1984

Our father Dr. Shih-tsin Tung died on April 16, 1984 in California, USA. In his will, written on April 8, 1984, our father mentions pending compens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ating to his farm in Jingkou, Chongqing, Sichuan, which is now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s result of the PRC government's attempt of making adjustment of its past policies. In his will, our father wishes first to use the money to rebuild the pagoda outside the north gate of the city of Dianjiang (垫江), the city of his birth,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ople of Dianjiang would contribute needed labor and additional funds. If the people of Dianjiang are not interested in such a project, our father then gives us, his four children, the full authority to disburse those funds as we see fit.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 people in Dianjiang are not interested in rebuilding the pagoda, therefore we wish that the funds be used in a more meaningful way. We know that China has been striv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 and we would lik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its success. Thus, we have decided to donate the money, in our father's nam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Sichuan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 1) The funds, to be named the "Dr. Shih-tsin Tung Scholarship for Agricultural studies," will be designated as an endowment to support student(s) at the Southwest Agriculture College (西南农学院) for advanced studies (beyond the B.A. degree) in a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 2) We would like to entrust the Southwest Agriculture College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 We would be greatly honored if our father's life-long close friend Mr. Hu Zi'ang (胡子昂)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人民政协) would be willing to assis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cholarship.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governmental units for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farm has been conducted by our uncle Mr. Dong Shiheng (董时恒) of the Sichuan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in Chengdu, our cousin Dong Baojing and her husband Hu Ronglun (董保静, 胡荣伦), and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ir diligent efforts in this matter. Since we have decided to donate the entire amount of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farm to the fore-mentioned educational purpose, we, therefore, decide that future negotiations should be entrusted to the designated trustees, namely the Southwest Agriculture College and its superior,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e understand the amount of the compensation may be about 30,000 RMB. We would appreciate it deeply if the Southwest Agriculture College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ould accept our trust and our donation for such a purpose.

董时进子女捐赠政府补偿金备忘录^①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84-XZ-51。

了北温泉、缙云山,访问了自己曾经一手创办的大新农场,看望了当年农村的工人董可青,拜望了戴永福、熊正伦等老友。他原计划要回垫江老家,但当时垫江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他只能遗憾地返回了美国。这次回美国后他写了《大陆之行》。

1981年4月,他第二次回国时,垫江开放了。他先飞到成都探亲访友,游览了武侯祠、都江堰等名胜古迹,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先生、省民盟负责人潘大逵教授,原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教授,以及陈志潜、魏时珍、任筱庄等老友。在回垫江的途中,老人家指点山水,谈笑风生,重申了他当年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之主张。每遇高架水槽,必停车登临,做实地考察,看水槽里有没有水,通不通水。这次回美国后他写了《重返大陆》。

1983年5月董时进作为顾问,随翁绍裘先生的“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代表团”集体回国观光,先飞成都,继来重庆,在参观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后说:“(当年)若无周氏斡旋,中国不知还要乱成什么样子。”他回美国后写了《再去大陆》,诚心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批评台湾当局拒不接触、谈判的错误态度。

董时进晚年发表的文章,对邓小平先生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极为赞誉,并充分肯定祖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活动。他提出主张,奔走于太平洋两岸,访问政要。正在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准备为祖国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的关键时刻,他被查出患了癌症,于1984年4月16日病逝。

六

虽然当年董时进远走美国时,西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还没建校,但他与西南农业

大学还是有渊源的。在西南农业大学,他有一个堂哥董时厚,还有我父亲、侯光炯、毛鸿恩等几个学生。

父亲百年之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抽屉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小张父亲从1995年1月20日(211期)的西南农业大学校报上剪下来的剪报,标题是《引导学生走实践成才之路——学工部龙力副部长谈董时进博士论文奖的由来》,该文是以记者与龙力副部长问答形式写的。这张巴掌大的剪报简单介绍了董时进的经历,以及他子女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将政府落实政策,发给他的井口农场房地产补偿款,全部捐赠给西南农业大学作为奖学金的事情。

学校为了不辜负董时进博士的心愿,纪念他关心青年成长的爱国行动,于1987年特设立“董时进博士农业科学奖学金学生优秀论文奖”。该奖项的实施是从1987年开始的,每年的10月评审,11月1日的校庆日颁奖,奖品为证书和奖金。该奖项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鼓励学生把参加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经验和成果,写成论文参加评选。如农工学院的一个同学到华蓥山某印刷厂挂职副厂长,他经过实地考察,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写了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呈给当地政府,赢得了65万元贷款,为该厂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从以上事例可见当年董时进先生对西南农业大学的捐赠,起到了鼓励、资助献身农业科学并为祖国农业建设做出贡献的学子的作用。学校的青年学生也没辜负他老人家的愿望,让他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振兴祖国农业科技、改善农民生活、为农民谋福利、提高农民地位的心愿得以延续。

(编辑 姚楠)

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董时进

□文/封期平

一心为农 一生为农

董时进是一位真正的农学家,他一生志趣在农,为农师、任农官、谋农利、营农艺、办农刊、兴农会、创农党、建农场,著书立说言必议农论农惠农,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小生长在还处在自然经济下的农村,看到“沃野千里,利弃于地”,便立下学习农业的宏愿,欲“求得工具”,以改变农民“墨守成规,靠天吃饭”的宿命。从开蒙到学成,他从垫江走向重庆、上海、北京、美国、欧洲,无论眼界怎样开阔,他心里一直关注着故园神宇。1925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当系主任、院长,后来在江西农业院任院长。在江西,他亲身从事农业改革,取得不菲的成就。到抗战时期,他终于在陪都重庆建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农场,作为从事农业改革,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实验基地。虽然他最终未能亲自在自己的祖国实现改变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宏愿,但是这个理想却须臾未放弃。

董时进留美归国后,本可以十指不沾泥,体面而舒适地任农师、当农官。抗战期间他不惜血本在井口投巨资,建大新农场。在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夏日,头戴草帽,一身短衣短裤下地劳动。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论证他为农民谋福利的宗旨的可行性。为他主张的重农、营利农业论取得第一手资料。建场之初,要将这片贫瘠的山坡种上果树很艰苦,但他总是身体力行作表率,他经常与农工一起头戴草帽,脚穿破鞋,在地里施肥、除草、浇水、剪枝、嫁接,累得满头大汗,身上、手上被树枝挂出一条条血痕,完全看不出是留洋博士和大学教授,俨然一个现代农民。那时这个农场有果树2900多株,年产水果1.4万多斤,

还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品种优良的各类果苗。收获的各种时令蔬菜水果及各种农产品,供应重庆市场,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其中柠檬除了供应重庆市场外,还空运到上海去卖。

董时进一直想自己办农场,早在1926年他就在老家垫江自办新式农场,但因各种原因失败。1934年4月董时进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担任江西省农业院首任院长。在任职期间他事必躬亲,积累了不少他日后在重庆办农场的实践经验。在江西设立农业院是蒋介石的提议,他要求江西省政府面对全省久经战乱、经济凋敝、生产不振的现状,“设立大规模农业机关,以负改进农业、复兴农村之



董时进(右)在田间考察^①

任务”。根据这一定位,江西农业院是全国第一个省级专门的农业机关,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创举。江西农业院负责全省农业技术改进、农业科学推广。

^①图片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824/22/5806104_309662942.shtml。

董时进在农业院主持工作期间,试种宁红茶,从事中国棉和美国长绒棉等品种的比较、杂交试验,设立乳牛场、种禽场。引进国内外畜禽优良品种推广,并进行杂交繁殖试验。他还设立了专门的农业推广处,督导各县的粮棉优质高效生产。农业院还建立了蚕桑改良场,推广、饲养、繁殖柞蚕、桑蚕良种,研究改良缫丝技术。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董时进带着妻儿回四川,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该会在1940年被“国际农业协会”接纳为会员单位。

大约在1930年左右,董时进曾同著名学者翁文灏、任鸿隽等人入川考察,针对冬水田多用一季的问题写了一篇报告。除向四川省当局献议外,还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后来他又将冬水田多用一季的重要性及未能利用的原因写进了其代表作《农业经济学》一书之中。董时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三次重返故乡除探亲访友外,还是最关心农业科技、农业政策、农业经济的发展。董时进后来回垫江高兴地看到他当年到处献计献策,到处宣传动员人们充分利用冬水田的建议,终于得到了实施,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看到当年提出的为农民谋福利的建议,也正在逐一得到实施,特别是看到家乡农作物长势良好,甚为欣慰。回到美国后连续撰写了长文《大陆之行》《重返大陆》《再去大陆》,在《美洲华侨日报》上发表,畅谈了访问感受。他感受最深的仍然是自己的老本行——农业,他对他在回故乡路上看到沿途及故乡的农田里庄稼都长得很好,写道:“这当然和天气有关,但是根本上还有其它增产的原因。”“一个是耕种的制度改变了,集体耕种已经改为个别耕种。在垫江,据说水田旱地已一律改成个别耕种。同时化学肥料也广泛利用了。”

锐意创新的农业经济学家

2001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介绍自严复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状况时说:“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如果看一下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大家经常能看到的经济学家有董时进、许璇、何廉、方显廷、李锐等,都对当时经

济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一文中,谈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时,林毅夫列举的第一本农业经济学代表著作就是董时进的《农业经济学》。除了《农业经济学》外,董时进还著有《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等多本专著。

董时进对中国农业及工业该如何发展的思想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在1923年到1924年春,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中国立国事业之讨论》《论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其主要论点就明显主观片面,不符合现代化工业化的时代潮流。他早期的这些不成熟的观点受到了杨铨、恽代英等人的批评,但反对外资开发富源的主张又得到恽代英的部分肯定。董时进是个不断进取又不囿于成见的人。他留美开阔了眼界及思路归国后,又通过大量的实践调查逐步认识到,发展农业与工业化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作用的。他在后来的《理想的东亚大农国》中提出一国可以同时为农业国和工业国,建设农业国与振兴工业并不矛盾。“营利的农业,根本性质与工业无异,仅是生产之种类不同。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的农业,由仅供糊口的家庭生产事业,改为有利的生产事业,把我们的农民改为实业家。”进一步指出了农业本身也应工业化、产业化。在《论复兴农村》中,他认识到,救济农村不能专门在农村内部绕圈子,应从发展都市工业入手,工商业发展对于农民至少有两重利益,一为农产品价格可以提高,二为创造了工作机会,消纳了农村过剩人口。同时提出了都市工商业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这一“以工促农”的论断。他又在《工业要跟得上人,农业要赶得过人》中提到:在工业化的战略中,农业不但不应被轻视,还应特别重视,将农业经营成国家的优势产业。他主张对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向进行根本改造,发展国际化、市场化、产业化的现代化进取农业。生产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以取代进口粮食,以营利的经济农业逐步取代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种粮农业。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认为农业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特殊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中国农业的方案。针对土地产权变更频繁,会造成水土流失严重,频频引发灾害,地

力下降等一系列恶性循环，他除了一再强调保护私有制财产的重要性，还于1936年在中国首次系列提出了山坡地退耕还林还草主张。作为民国时期重农派和维护土地私有制思想的代表，他的经济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特别是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了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后，才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到的问题。

相关领域的时代前沿者

董时进是中国最早将保护自然资源与计划生育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系起来的科学家。

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大水灾，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农村经济急速衰落。董时进通过实地调查后意识到农村土地的土壤破坏，是因人口无计划地增长导致的过度、任意开发，已经破坏了生态平衡。如不及时有效控制人口，引导富裕人口谋生，就会因无序垦荒造成水土流失，导致灾害频发。他在《土地破坏与农村衰落》中写到：其实土地破坏的罪魁祸首、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人们不计划生育，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增长，造成对山坡的过度、无序开发，形成恶性循环。董时进在实地考察后发出警告：“若不赶紧挽救，大好良田与山林都将变成沙漠和石岩，岂但造成灾荒，真可以亡国灭种。”他还从农业经济与社会多个角度反复论证了中国节制生育的必要性。他通过长期实践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土地问题，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动力过剩。为了保持必要的人均耕地，他在中国最早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他在《中国何以必须节制生育》中指出：中国人均耕地远低于美国、法国。从动态观察，人均耕地会越来越来少，今后为了水土保持必须将部分耕地还给江湖和森林，为了农民增收广种经济作物，种粮食的土地减少，加上工业化后交通、学校、工厂、城市的发展占用耕地，人地比例会越来越失衡，只有控制人口才能保持一定的人均耕地。他还在《资源保存于民族复兴》里提出：中国并不一定要四万万五万万人，有一万万两万万也可以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如果四万万人中有两三万万时常过着非人类的生活，倒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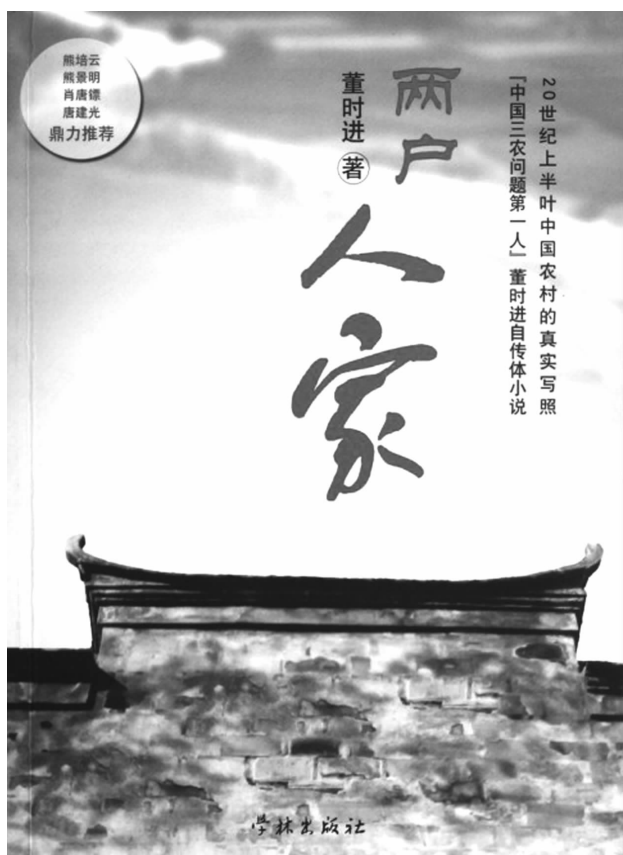
只有一两万万，大家都过高尚满足的生活。这样情形的国家才能强盛，物质和精神文明才能进步……，我们对于人口的增殖，决不能再行放任，必须广泛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的办法，与资源的保持同时进行。

董时进系统提出了山坡地退耕还林、还草主张。他提出，停耕山地、种林种草是保存资源的根本挽救办法。首先是限制山地的开垦，并将已开垦而不宜开垦的山坡停止耕种，分别种植牧草或栽培树木。1944年董时进出版《国防与农业》，该书在第十一章专论“水土保持与水利问题”，他强调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之前，应统筹规划，并提出退耕还林要特别注意农民安置。“要将山地停止耕种，必须对于原来居住耕种之人民，设法救济，使能另谋生路。政府必须帮助农民迁徙及改业，或使之另行获得耕种之土地及经营资本。”“停止耕种之土地，并非停止生产，不过改变用途，嗣后经营林业及畜牧，仍须有人从事。某处地方或须划作矿产，其它地方或须培植风景，供人游览，故随处皆可以创造职业机会。”他的这一主张60多年后得到了全面的实施。2002年国家制定的《退耕还林条例》出台，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退耕(田)还林(草、湖)运动。他提出的营利农业论、水土保持论、节制生育论等理论，对今天的“三农”问题也有启发。

萧萧文字情系祖国

董时进不是专业作家，可能也不曾特别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农村社会的描写，他只是不能忘怀万里之外的故国乔木和早已远逝的少年岁月。他把昔日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那些激励他读书向上的亲朋的深切怀念之情，与自己当时的心境融合后的理性思考用笔写下来，给我们这些后辈一个了解20世纪农村生产生活情况的途径。

董时进一生经历丰富，精力充沛。他又是忧国忧民、有胆有识、无私无畏，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的人。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他那当年敢于上官府衙门打官司的祖母的，带着不畏强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的遗传基因的血。所有的这些造就了他从一个农业经济、园艺专家、活跃的农民党组织者、杂志编撰者，发展为青涩的文学青年，一步步走向文学成年直至文学家。早在他从国外回来之初，就是胡适的《独



《两户人家》封面^①

立评论》的撰稿人。1934年4月他因担任江西农业院首任院长,最初两年时间里,因为“农忙”暂时停止了给《独立评论》撰稿。当他稍“闲”便重新为《独立评论》撰稿时,胡适在编后特别提到“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欣然之情,跃然纸上。思想活跃,有胆有识又无私无畏的他到香港后闲不下来,要将他的想法及所见所闻表达出来,于是开始了他的业余笔耕。我想,在这以前除了发表政治或学术论文外,他青年时期写的《农人日记》就是在文学领域的牛刀小试。如果说那时算是文学青年

的话,从1950年在香港期间记录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的旅行笔录开始,就是它的文学成年期。他在其中一本笔录中写道:“我所到过的地方,包括这种旅行,虽不过是走马观花,而且也不能做什么调查性的活动,然而因此所见到的景象和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物却不少。凡所见所闻,如其是可靠而有时值得注意的,我便将它笔录下来。”

他到美国后,除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还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并且还以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写了《两户人家》《阿宝救牛记》两本小说。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如果说《红楼梦》是描述古代官场家庭及封建社会,《水浒传》是描述绿林豪杰,《两户人家》乃是近代社会及普通人家的缩影。”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阿宝救牛记》“这是一篇可歌可泣的贫儿奋斗史”,这本书已被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人人文库”。

总而言之,董时进是真正的中国农业专家,也是真正为中国繁荣富强而呕心沥血辛勤工作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一辈子视民主为“宝贝”,视“乌纱帽”为草芥。从海外回国之初,他为鸣不平,连辞北大农学院、川大农学院两所名大学农学院院长之职。今年的4月16日是董老离开我们30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记住这个有传奇精彩人生的老人,记住他,学习他有胆有识、无私无畏、敢作敢为、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编辑 范韵杰)

^①图片来源: <http://product.dangdang.com/1323641908.html>。

柳亚子赠诗刘兆吉之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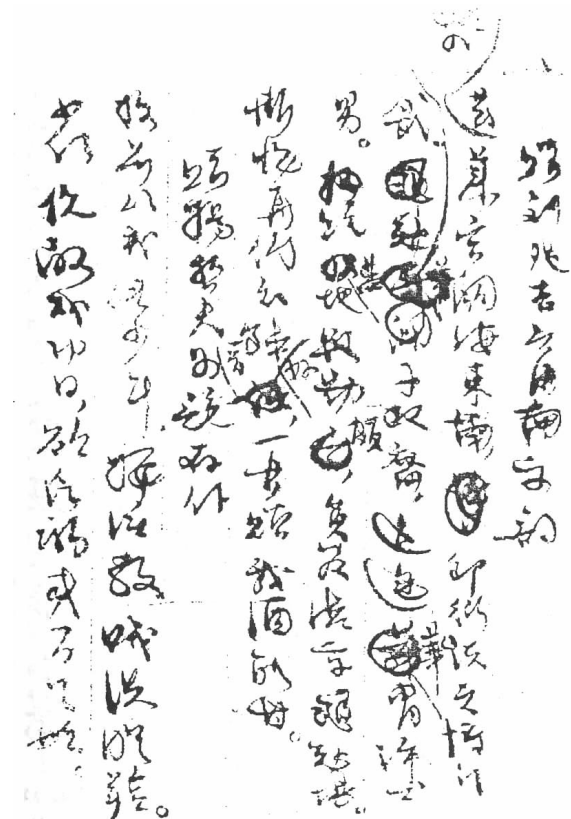
□文/刘重来

1985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出版的《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有一首是柳亚子在1945年写给我父亲刘兆吉^①的诗:《赠刘兆吉,六用南字韵》,全诗如下:

蓬莱宫阙海东南,邹衍谈天博望龛。
淹贯九流子政裔,迢遥华胄沛公男。
执经燕地殷勤颇,负笈滇京勉堪。
惭愧再传衣钵好,一书赠我酒能甘。^②

这首诗是1945年柳亚子约父亲刘兆吉到他家去,他当场挥毫,以自备的宣纸写成赠给父亲的。柳亚子还特意在上面盖了两方印章,一方为“柳亚子印”;另一方较大的印章刻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③。在这首诗中,柳亚子巧妙地写出了父亲的家世和读书经历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父亲非常高兴,立即将它装裱起来,挂在客厅中堂上。我小的时候天天都看到它,但全然不懂它的内涵。可惜的是,它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幸而柳亚子保存有这首诗的底稿手迹,原件现藏于苏州市博物馆,父亲特意请人复印回来留作纪念。

柳亚子德高望重,诗才很高,怎么会和我父亲刘兆吉——当时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员相识,并有赠诗之举呢?这就要追溯到父亲1935年在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读书之时了。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教授正好教父亲所在班的英语。父亲上大学前,只是个中师毕业生,英语基础本来就差,又在农村教了两年小学,英语就更荒疏了。因此,在柳无忌所教的英语班上,父亲是个“三等学生”,学起来十分吃力。特别是



《赠刘兆吉,六用南字韵》底稿手迹^③

父亲念英文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被柳无忌戏称“山东英语”。而柳无忌又是一位要求特别严格的老师。一开始,父亲特别怕上英语课,怕出洋相。为此,父亲把很大精力都用在英语上,且在上每节英语课前,都要做充分准备。这样一来,父亲的英语水平慢慢就赶上来了,而且从害怕上英语课到喜欢上英语课,这样,柳无忌与父亲的师生关系更融洽了。

^①刘兆吉(1913-2001),中国现代心理学家,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文艺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美育心理学学科创建者,西南大学原教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文科主任,原四川省心理学会理事长、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是建国后中国最有影响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之一。

^②论语·述而。

^③图片来源:刘兆吉.刘兆吉诗文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中年柳亚子^①

父亲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任教,住在津南村13号。想不到1944年9月,柳亚子由桂林来到重庆,住进了津南村11号,与我们成了邻居。父亲从中学时就读过柳亚子编的《曼殊全集》,也读过他的一些诗词,对柳亚子早已

十分敬仰了,如今成了邻居,自然很想认识讨教。经师母、柳无忌的夫人高蔼鸿的介绍,父亲与柳亚子相识。柳亚子得知刘兆吉是柳无忌的学生,也十分高兴,父亲以“太老师”相称,关系就更亲切了。

柳亚子先生和蔼可亲,对年轻晚辈没有一点架子,所以父亲常去讨教。柳亚子得知父亲喜欢读诗写诗,也常把自己的诗作让父亲学习,耐心回答父亲的问题。父亲还记得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是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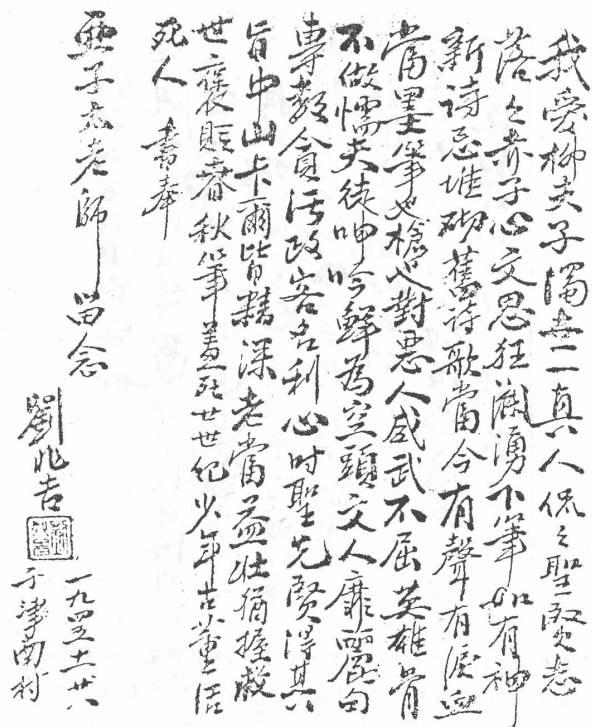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要到南开中学津南村拜访柳亚子,得知消息后,柳亚子十分理解父亲想见毛泽东的愿望,特意让父亲以亲属身份站在自家门口,父亲得以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当时国民党宪兵以“保护”为名,封锁了津南村的路口,一般是进不来的。当时父亲还牵着我一起去的,可惜我当时年龄太小(只有4岁多),完全没有印象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10月24、25日,柳亚子与著名画家尹瘦石^②在重庆黄桷垭口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特意送来一张请柬,邀请父亲与他一起去。父亲考虑到柳亚子年事已

高,到展出地点不仅要乘公共汽车,而且还要步行、坐黄包车,太不方便,所以很愿意陪同前往,以便路上照顾。父亲还记得他俩坐公共汽车到了七星岗后,再坐黄包车到中苏文化协会路上的一幕:

解放前的山城马路,狭窄、崎岖、高低不平。七星岗以下有一段陡坡,下坡时要“飞车”,即车夫不拉车,反而被车子推着跑。柳老先生与我分乘两辆黄包车,他的车在前,我的车紧紧随后,柳老先生已年近花甲,我很担心他老人家的安全。当时我看到柳老先生双手扶着车斗两边,昂首前望,胡须迎风飘动,神态安然,“今屈原”在我脑中闪过。安全到达会场后,我才松了一口气。^②

更有意思的是,我和哥哥刘庆来是双胞胎,当时都才4岁多,不懂事,常常不打招呼直接推开柳亚子家的门去找他的孙子玩。一次柳亚子正在伏案写作,我一推门进去,直接进到里屋去玩了。过了一会,我哥哥又推门进来了,我和哥哥长得很像,柳亚子十分

刘兆吉写的《我爱柳夫子》一诗^③

^①图片来源: <http://www.wujiangda.gov.cn/webPages/DetailNews.aspx?id=9606>。

^②尹瘦石(1919-1998),江苏宜兴人,著名书画艺术家;他的艺术始终紧紧踏着时代节拍而歌,深得郭沫若、徐悲鸿等文化巨擘的赞赏;1945年在重庆为毛泽东画像,与柳亚子举办《柳诗尹画联展》。曾任中国美协内蒙古分会主席、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

^③图片来源:刘兆吉.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吃惊,没看见这个小孩出去,怎么又进来了呢?后来他还以此为笑话,给他的孙子讲故事、猜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柳亚子即将离渝赴沪。11月底,他将一厚册有很多名人名家题诗的精美纪念册送到我家,要父亲在上面写诗留念。父亲又惊又喜,又感到荣幸,因为自己只是个中学普通教员,怎敢与纪念册上那些大人物相提并论呢,但为了不辜负柳老的心意,仍鼓起勇气写了《我爱柳夫子》一诗,并用毛笔恭正题写在纪念册上。如今,在苏州市博物馆保存的这本纪念册上,仍有这首诗,父亲也托人把它复印回来。此诗全文如下:

我爱柳夫子

我爱柳夫子,浊世一真人。
侃侃圣贤志,落落赤子心。
文思狂澜涌,下笔如有神。
新诗忌堆砌,旧诗歌当今。
有声有泪血当墨,笔也枪也对恶人。
威武不屈英雄骨,不做懦夫徒呻吟。
鲜为空头文人靡丽句,专教贪污政客名利心。
时圣先贤得其旨,中山卡尔皆精深。
老当益壮犹握救世褒贬春秋笔,
羞死二十世纪少年古董活死人。

父亲说,这首诗始为五言、七言,后又是九言、十三言长句,可算不古、不律、不新、不旧、杂乱无章之作。现在看来,毛病不少。父亲说他将这部纪念册奉还给柳亚子时,“柳老一面阅读,一面捋须颌首连连称好”,他才放下心来。当然他知道诗写得并不好,柳老称好是对他的鼓励。

1986年,在柳亚子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写了《怀念爱国诗人柳亚子》一文,回忆了他与柳亚子相识相知的经过,深切怀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附1:柳亚子简介

柳亚子(1886-1958)是著名爱国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总统府秘书。1923年发起新南社,任社长,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1924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委。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发表著名的《为皖南事变致蒋介石》的“四人宣言”,谴责国民党

倒行逆施,无异秦桧之加害岳飞,竟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4年9月到重庆,卜居南开中学津南村。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两人3次会晤,相互赋诗唱和。1948年参与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秘书长。解放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一位被社会各界广泛敬重的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郭沫若称他为“今屈原”。

附2:《赠刘兆吉,六用南字韵》注释

蓬莱宫阙海东南

蓬莱:县名,山东东部。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

宫阙:古代帝王所居门外有两阙,故称宫殿为“宫阙”。杜甫《秋兴》诗:“蓬莱宫阙对南山。”

因刘兆吉是山东益都人。此句指刘兆吉是山东人。

邹衍谈天博望龛

邹衍:即驺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人,齐国人,生于益都,是战国末哲学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提出“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所谓“大九州”说,是说中国只是世界八十一州的一个州,每九州为一个集合单位,称“大九州”,有小海环绕。九个大九州,另有大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当时人称他为“谈天衍”。

博望龛:博望:古县名,西汉置,今河南方城西南,汉武帝曾封张骞为博望侯。龛:供奉佛像或神像的石室或柜子。

此句指刘兆吉出生在山东人杰地灵之地。

淹贯九流子政裔

淹贯:淹贯博通,指学识高深,《新唐书·柳登传》:“淹贯群书。”

九流:先秦学术九大流派: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

子政:刘向的字。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裔:后裔。

此句指刘兆吉是大学问家的后裔,此非考证之语,而是赞赏之语。

逍遥华胄沛公男

逍遥:远貌。江淹《横吹赋》:“逍遥冲山,崎曲抱津。”

华胄:华夏族的后代,旧谓显贵者的后代。

沛公:汉高祖刘邦,沛县人(今属江苏),人称沛公。

柳亚子此句仍指刘兆吉是刘氏显贵者的后代。

执经燕地殷勤颇

执经:手持经书,指读书,燕地:旧时指河北一带地方。

此指刘兆吉 1935 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且十分勤奋。

负笈滇京龟勉堪

负:背;笈:书籍。负笈:指外出求学。滇京:云南昆明。

龟勉:亦作“龟俛”,勤勉、努力。《诗·小雅·十月之交》:“龟勉从事,不敢告劳。”堪:经得起,忍受。

因抗战爆发华北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师从京、津奔赴昆明,刘兆吉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湘黔滇步行团”,与 200 多名师生从长沙步行 3 500 里到昆明。所以柳亚子此句是赞赏刘兆吉不畏艰难、跋涉千里求学之举。

惭愧再传衣钵好

惭愧:是柳亚子的自谦之词。

衣钵:佛教名词,指佛教的袈裟和食器。中国的禅宗师徒之间传授道法,常付衣钵为信,称为“衣钵相传”。如今一般学艺上的传承也称“衣钵相传”。

再传衣钵:指刘兆吉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教授其英语的老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教授,所以刘兆吉称柳亚子为“太老师”。

一书赠我酒能甘

一书赠我:指刘兆吉将自己的著作《初中作文教学法》(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赠给柳亚子。

酒能甘:宋代诗人苏舜钦每晚读《汉书》,每看到精采处,就拍案叫好,并满饮一杯酒,常常要饮酒一斗。此为脍炙人口的“《汉书》下酒”的故事。柳亚子用这个典故来比喻他很喜欢读刘兆吉的赠书,可用来下酒。

参考文献:

- [1] 编者的话[M]//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2] 刘兆吉.怀念爱国诗人柳亚子[M]//刘兆吉.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0.

(编辑 刘润)

诗人老去风情减，犹有峨眉伴晚晴

——记吴宓和邹兰芳的一些往事

□文/江家骏

一

1950年9月，我考入了重庆大学外文系，吴宓老师当时在重庆大学兼课，我有幸成了他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我服从统一分配，先到了内江市二中，次年又调到新建的内江高中担任俄语教师。1957年经原重庆大学外文系系主任熊正伦教授（我大一时的英文老师）的推荐，经四川省教育厅同意，我被调往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外语系任教。当时吴宓老师在历史系教世界古代史课程，我便经常去请教他。20世纪60年代，我又作为吴宓老师的助手，脱产跟他进修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浪漫派诗歌，与他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一次，复旦大学教授徐燕谋赐我旧体诗一首，我拿去给吴宓老师看。随后，徐老又寄来一首诗，由我转呈吴宓老师。该诗如下：

吴雨僧先生见我寄江君家骏诗后书名柬来候赋呈

抱柱今谁似尾生，负心自古说倾城。

诗人老去风情减，犹有峨眉伴晚晴。

吴宓老师看完这首诗后，说这首诗是在说他。我也知道，因为诗的头两句是说吴宓老师与毛彦文女士之婚事不成，后两句就是说他与邹兰芳女士之结合。

二

关于吴宓老师和毛彦文的那段恋情，在当时可说是家喻户晓。吴宓老师的第一任妻子是其同学的妹妹陈心一女士。然而，为了追求毛彦文，他与陈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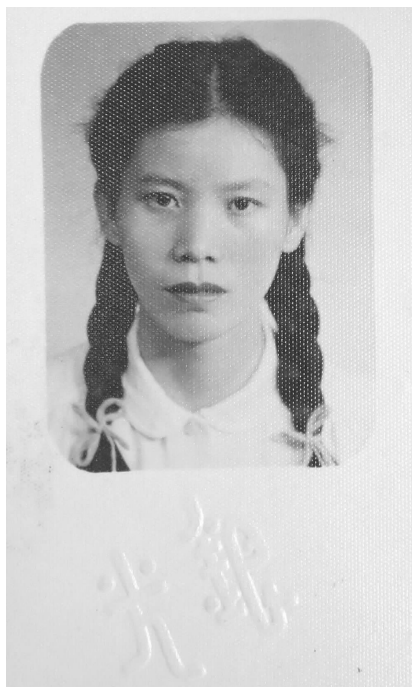
一离了婚。关于离婚的原因，吴宓老师自己是这样说的：“尤其在北京那种场合下，认为我的太太英文不行，很多地方不能带她去，我理想中的太太懂得英文，中国的诗词歌赋，最好是懂得法文，但我觉得我是很严肃的人，因而陷自己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之中。”（据1953年6月5日检查记录）

随后，吴宓老师对毛彦文展开了锲而不舍、愈演愈烈的追求，并最终打动了毛彦文的芳心。当时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吴宓老师曾说：“在平筹备住宅及婚礼等事。”不知为何对于结婚一事毛彦文总是一推再推。1933年12月8日吴宓老师在给当时他的一位从暹罗来清华留学的学生陈仰贤女士的信中写道：毛彦文“自己要求阳历年假（Jan.1-3）来，宓尚未回复，毛彦文又要求寒假（Jan.20-Feb.5）。”吴宓老师在该信中还告诉陈仰贤说：“以前毛彦文在哈尔滨、在天津，每次与我一人独在一处之时，便说：‘正在月经期中’，以便我不能侵



毛彦文^①

^①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ec9abf0101sgpd.html。

邹兰芳^①

犯她——当时我认为她要为许君守贞而拒绝我。”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程度非同寻常。

不过吴宓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等到毛彦文同意结婚后，他又彷徨不已，患得患失，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后来，毛彦

文在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的热烈追求下果断地嫁给了她同学的父亲熊希龄。熊希龄病逝后，吴宓老师又对毛彦文展开追求，然而毛彦文却心如磐石。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吴宓老师与毛彦文的爱情走到了终点。

吴宓老师对毛彦文的痴情，持续了一生。吴宓老师也从不避讳他与毛彦文的恋情。而且写了不少有关她的诗，最著名的也许要属题目为《吴宓先生之烦恼》中的那四首了。其中第一首是这样的：“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训，金钱名誉何足云。”

三

邹兰芳是吴宓老师的第二任妻子，1927年出身在四川万源罗文坝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娇生惯养，由于身体不好，家里人都姑息迁就她，对她总是百依百顺。解放初，她的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政府镇压，家产被分，父母也相继亡故。邹兰芳的家庭出身不好，又患有肾结核，加上还要抚养兄长留下的几个遗孤，她的处境变得很艰难。邹兰芳是吴宓老师的学

生，吴宓老师出于同情而开始资助她。随着往返次数的增多，邹兰芳由感激而心生恋情，并不避世俗，主动示爱。据吴宓老师自己说：“邹喜宓文学，很崇敬宓，但宓已老，无意再婚，只能有师友之交谊而已。”尽管吴宓老师一再自持退却，但邹兰芳并不气馁，终为婚姻。

1949年秋，朱宝罗教授把正在相辉学院法律系读书的邹兰芳介绍给吴宓老师，让她向吴宓老师学习中国旧诗词。邹兰芳崇拜吴宓老师的学问，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浆洗缝补。1950年9月邹由相辉学院转入重庆大学法律系三年级。我在1950年9月考入重大外文系后，便与邹兰芳成了校友。我常见吴宓老师到女生院（就是女生宿舍）去找她。因为我和吴宓老师的师生关系，吴宓老师也曾与邹兰芳提起过我，因此邹兰芳对我也颇了解，我们平时见面都打招呼。我记得每次我碰见她，特别是当她和吴宓老师一道在校园散步时，她总是常常带着一种一般少女的腼腆，嘴角常常挂着微笑。

1951年上半年，正在重大法律系读书的邹兰芳，和其他一些学生被派到川西眉山参加土改运动。同年5月1日吴宓老师写了《送邹兰芳赴川西土改即赠四首》，诗中出现了“覆巢地主除应尽”、“僧颂佛名行剑事”这样的句子。1951年12月上旬，吴宓老师主动坦白他写的反动诗，承认自己“犯大错误”。我记得当时在重庆大学图书馆内，把他的诗公布出来，供大家去看和批判。有一天，我刚刚从图书馆看了他的那四首诗出来，就在图书馆附近碰见了，我对他说：“吴宓老师，您怎么这样写呵？”他马上一边摆手一边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已经批判过了！我已经批判过了！”后来他解释他写这几首诗的原意是“地主已缴出土地，则当一个都不必杀，应尽恕其前罪，不可阶级报仇。”而我则以为吴宓老师是对邹兰芳家人遭镇压，以及邹兰芳家庭和她本人不幸遭遇的同情。

1952年邹兰芳在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随即进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司法干部训练班。根据有关资料，吴宓老师在1953年1月11日就曾提出与邹兰芳结婚，当时邹兰芳还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司法干

^①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720-002。

校史校情

部训练班学习。干训班领导对他们的结婚并不是十分认同,似乎有人认为如果吴宓老师结婚,就有可能犯重婚罪。因此,吴宓老师在元月17日与24日分别在给邹兰芳的信中说:“弟所拟报告(指邹所拟请组织批准他们结婚的报告)暂缓交组织,并勿以结婚之事语人,怕说我们重婚。”(据1953年3月2日干训班上报材料)由于干训班组织对吴宓老师与邹兰芳申请结婚的态度显得有些从中作梗,邹兰芳当时非常生气,甚至在学习班上出现摔东西等情况。经过一番波折后,直到当年的6月8日两人才在重庆沙坪坝主管机关登记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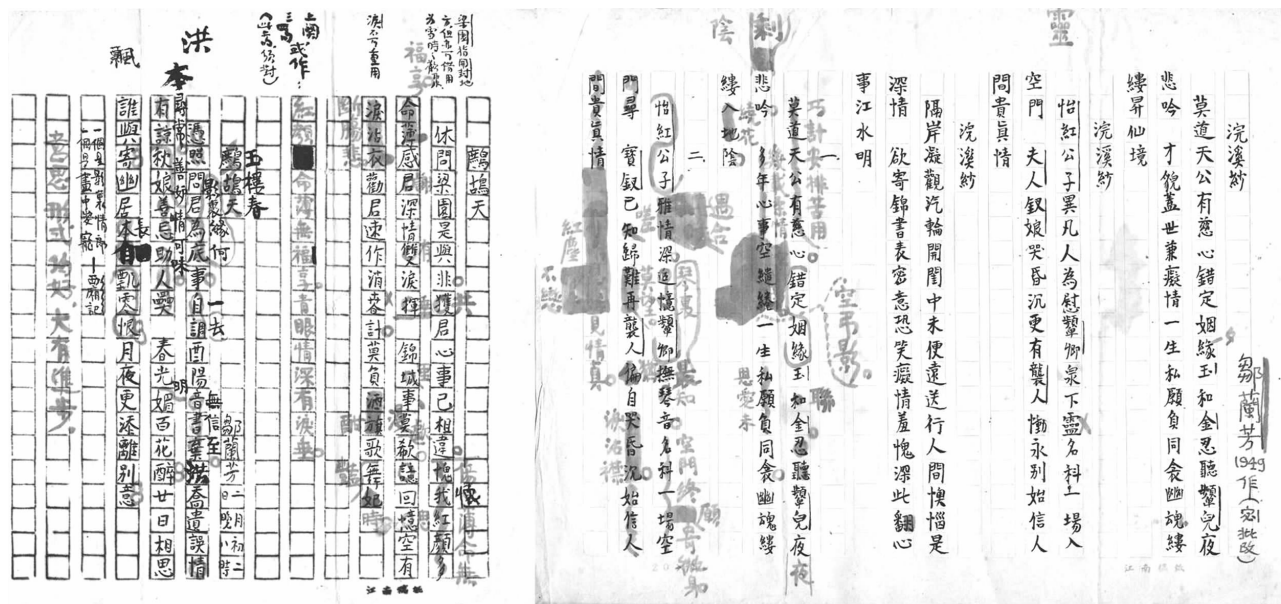
1953年6月下旬,邹兰芳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分到西南师范学院,7月初派充学前教育系系务助理员。邹兰芳上班仅10天后就请了病假,7月15日晚入北碚第九人民医院,当晚小产一女,殇。邹兰芳产后即新发现结核性脑膜炎(系关密性,绝不传染)、急性粟粒性肺结核及子宫结核三种病,生命岌岌可危。邹兰芳在北碚第九人民医院住院,同年11月7日,遵医院指示出院,回到学校与吴宓老师共同居住在民主村三舍一号宅。

邹兰芳因使用链霉素引起副作用,出现耳聋贫血、身弱、易疲倦等状况,不能久坐读书、写字,无法正常上班。1954年7月19日,吴宓老师告诉学校人

事科,要求将邹之工资从下半年7月起(6月份仍发八成工资)“大大削减,甚至全停”,由他“自己勉力供给,俾可安心养病”。1956年,邹兰芳因病亡故。

1957年9月,我到西南师范学院后,才知道邹兰芳师母病逝了,我记得我曾写过一首悼念她的小诗,并抄呈吴宓老师,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原以为今天您会为我捧出喜糖,谁知我却把鲜花放在了您的坟上!”

邹兰芳师母病逝后,吴宓老师对她很是怀念。一起用完晚饭后,我常陪吴宓老师在校园散步,散步时他为我讲解英国文学或关于中国古典诗词方面的问题。当我们漫步到办公大楼正门前时,他总要驻足凝视对面的远山。一次他指着对面远山顶上有三根高压电线杆的地方,因为太远,只能隐约看见。他说,在第三根电杆下,就是邹兰芳师母埋葬的地方。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每次来到办公大楼正门前空坝上时,吴宓老师总要久久凝视对面的远山。记得有一次,我照吴宓老师的要求把他住的屋子从外部看见的情景画了下来送交给他。吴宓老师把它贴在书桌旁的壁上。在屋子内,一间空着的单人床靠墙的上方,吴宓老师贴了一张约一尺五寸长、一尺二寸宽的淡绿色土纸,恭恭正正地在上写了两个字:“兰室”。因为这间屋子和这张床,是邹兰芳师母曾经住过和睡过的。吴宓



吴宓老师为邹兰芳批改的稿子^①

^①本图片由江家骏老师提供。

老师还将邹兰芳师母生前所用过、学过的书籍,全部封存不动,放在特定的地方。我去看望吴宓老师时,他曾指着这些书,深情而忧伤地告诉我,这是邹兰芳师母的遗物。此外,逢年过节吴宓老师都要多摆两副碗筷,一为亡妻邹兰芳,一为亡友吴芳吉;甚而连看电影时,也要为亡妻邹兰芳买一张票,与其“同看”;每逢时节,吴宓老师还到亡妻邹兰芳墓前祭扫。不仅如此,吴宓老师对亡妻邹兰芳的侄辈子女也一如既往地照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能自顾时才中断济助。足见吴宓老师对邹兰芳的怀念之情。

四

大约是在2003年4月的一天下午,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是一位自称姓李的中年人,他说他从外地来,知道我曾是吴宓老师的助手,想请我帮他看一件东西,鉴定一下是否真是吴宓老师为邹兰芳批改的。他从一本书里取出两页稿纸来,刚刚展开,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吴宓老师的笔迹。我告诉这位中年人这是吴宓老师亲笔批改的,一点不假。我还告诉他,第一页第一行下方“邹兰芳 1949 作(宓批改)”这几个字正是吴宓老师的手迹,“邹兰芳”三字右旁先用墨画一竖线,后又补一红色竖线,也是吴宓老师的笔迹。

我问他这两页稿纸从何而来,他不愿多说,只说是他花钱买来的。我说这是我老师的东西,可否转让给我保存留作纪念。我又问他花了多少钱,我愿加倍给他。他说他花了五百元从别人手中买来的,我说:“我愿意给你一千元,你就转让给我好不好?”他迟疑了一下,终于同意了。我马上给了他一千元,他就把这两页稿纸给了我。

从邹兰芳所填的词中可看出,她喜欢读《红楼梦》,与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有几分相像。她梦想的生活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在一个乡间修一座茅竹屋,和二三喜欢文学的朋友居住,种地、栽花。在月明之夜,竹松林下,饮酒赋诗”^①。吴宓老师认为她是一个“仁慈而多情”的女子,因此吴宓老师会喜欢她、爱她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从这两页稿纸上吴宓老师用双色笔,耐心细致的批改和解释也都不难看出,从邹兰芳经朱宝昌教授介绍她从吴宓老师学习中国旧体诗词开始,吴宓老师就喜欢上了她。至于批语:“意思形式均好,大有进步。”更是充分流露出吴宓老师对她的关爱和吴宓老师自身的高兴。

这两页手稿,就留给有心的对它感兴趣的同志,去分析研究进一步发觉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吧。

(编辑 蒋云燕)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720-002。

我在巴山育黄羊

——记王维春校友

□文/谷剑飞

引子

在搜集和整理校友资料的时候，一张奖状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为表彰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者，特颁发国家科技进步奖证书，以资鼓励。获奖项目：南江黄羊肉用新品选育；奖励等级：二等奖；获奖者：王维春……”

王维春？

在无比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下，我们极己所能地找来了关于奋斗在基层一线的这位校友的所有资料。

王维春，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畜牧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巴中

南江县北极种畜场工作。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三十余年！这么多年一直在基层一线默默耕耘，还做出了如此大的成绩，当下我们便决定要来见识一下这位“黄羊王”！

我们辗转多处终于打听到他的电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已是2013年6月。这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得知有母校老师来看他，非常高兴。本来约的是下午三点钟见面，可是还没到两点，他就自己找到宾馆。一阵寒暄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简单而深刻的访谈。

山有多高，水有多远，我的新家又高又远

王维春是四川彭州人，在西南农学院读完书后，便接受组织分配来到这荒凉的大巴山中。我们问道：

去那么远的地方，你不后悔吗？王维春笑笑说：没有想过后悔。那时候我们只想，组织分配我们去哪里，就是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该去。朴实的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简单却坚实的选择。

这次从学校驱车去巴中市的时候，我们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一路高速，非常便捷。可又有谁知道，当年王维春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入山又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1963年的夏天，年轻的王维春和学校另外分配到四川达州

西南农学院学生学籍表

姓名		性别	个人成分	民族	系	专业	报到日期
王维春		男	学生	汉	畜牧	畜牧	59年9月6日
现在年龄	20岁(生于1939年8月)	籍贯	四川省彭县(市)	本人永久居住地			
学(初中起) 历	起迄年月	学校名称	学校地点	修业年限	毕业		
	53年9月起至56年7月止	四川省彭县中学	彭县外南普照寺	三年	毕业		
	56年9月起至59年7月止	四川省彭县中学	彭县外南普照寺	三年	毕业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工作 简 历	起迄年月	工作部门	工作地点	任何职务	离职原因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是否团员	团员	入党日期	59年10月	入党地点	四川省彭县	担任职务	
已否结婚		爱人姓名		爱人工作地点及职业		爱人住址	
家长姓名	王维贵	与家长关系	父子	家长工作地点及职业	四川省彭县人民公社	家长住址	四川省彭县
家庭所在地	四川省彭县	县(市)	彭县	社	普照寺	社	号

注：①学生只填这面。右下角的学号、班数及背面皆不填写。
②填写时必须用正楷，反对乱画。

学号 598022 姓名 王维春 第 2 组

王维春的学籍表^①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42-1991-212-131。

地区工作的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大卡车。那个年代,卡车都是“通用公司”的——拉货拉人通用,甚至客货混载。当时他们乘坐的卡车还装上了活动帆布篷,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了!途中,大家一路高歌,虽然是离开了学校,离城市越来越远,但是,大家想到是要去工作,去



一等奖获得者、推广研究员王维春代表获奖人员发言^①

一线,还是很亢奋。此时此刻,大家的心头自然而然地响起了一个旋律:“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辽阔、开朗、饱含着激情的歌声一路飘扬……

清早出发,一直到晚上,他们才抵达达县。在达州大概又停留了半个月,直到7月14日才去了巴中。当时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泥泞不堪的土路,一路的颠簸,让这些个年轻人都忍受不了,有人甚至晕车了!下车后,晕车的人一口气喝下二两白酒,才觉得舒服一些。在巴中又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才搭客车去南江,再由南江县农业科分配去了距南江县城60余公里的北极种畜场。简单的行李中除了衣物、铺盖,还带了一大箱的书,至少有几十斤,一直背了两天才上去。

就算是今天,我们一行四人再上北极种畜场,都觉得险象环生!可以想象当时要从山脚爬到海拔1200米的北极种畜场,谈何容易?

我们开的车是城市越野,但是王维春说,这车不行,上面种畜场派车来接。我们推辞着,不用那么麻烦,自己开上去就是了。等我们开车到了山脚,还是换成了从山上种畜场开下来的越野车。一同来接我们的还有现任的北极种畜场场长。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这山路时,我们心里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车子刚开过十几米的水泥路,就开始走石子路,三五米宽的山路,一边是

山石,另一边是杂草丛生的悬崖,而且弯道很多。再往前走,车下的石子越来越大,由于路太颠簸,我们的屁股几乎都坐不到座位上了,随着车子跳跃。尽管车速已经很低,但还是颠簸得要命。王维春老人一手抓紧了车上的把手,一边跟我们说:退休以后就没有上来过

了,一晃就16年了!这个路比以前好走多了,以前车子根本上不来。话还没有说完,车子“咯噔”一下猛地跳了起来,除司机外,我们三人都是一声惊呼。原来越野车遇到一块大石头,实在无法避让。据说,有时这条路上还会遇到滑坡和泥石流,曾经有一大片民宅直接被冲毁了!这下子我们才开始庆幸没有自己开车上来。

路边的树和草缓慢却跳跃般地后退,王维春断续的话语声在风中飘荡。他说,当年上山要从早走到晚,除了路险之外,还有豺狼等野兽出没。连山上的牛羊都时有被咬死或吃掉。有时候遇上极端天气,根本无法上来,只好在山脚处那个我们刚才歇脚的地方住上一宿。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山高水远的地方,王维春深深地扎下了根,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新家!

理想在天上,事业在深山,研究中的偶然与必然

来到北极种畜场后,王维春担任的是畜牧技术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极种畜场以种牛选育为主,省里也曾想把这里定作“种牛场”。但实际情况是,这里不仅有牛,还有羊、猪、鸡……跟动物园差不多!而且这里山高林密,牛的数量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伤亡率大,仅1963年冬天到1964年春天,70多头牛就死伤了一半。这是为什么?牛的个体太大,角长,或是钻到了丛林中无法回头,或是追逐的时候跌进山崖。反倒是山羊嗜食高草,善登山坡,喜攀悬崖,

^①图片来源: <http://www.scnjkj.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0>。

由此王维春总结出：山林草原宜羊不宜牛。

当时种畜场里的羊品种五花八门，有绵羊、山羊、白羊、黄羊、黑羊、花羊，还有本地麻羊……总共571只。王维春建议按种类分别饲养，因为不同种类的羊食性不同，生长习性也不同，混养在一起不利于个体的发展。场长很支持，说你是大学生，就按你说的办吧，同意了这种做法。

很快，王维春将羊进行了分类：白羊和花羊一组，黑羊一组，黄羊、黄麻羊一组，并且各自配备了专门的饲养人员，对比测试和跟群放养。正是通过这样分组的方法，王维春发现，黄羊具有长得快、体格壮、皮毛好的特点，于是决定把黄羊作为育种研究对象。同时，他还撰写了含有牛、羊新种培育相关内容的《北极种畜场的经营方向和育种方向的建议提纲》，呈给了县主管部门。1964年的时候，在再一次跟群放养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发现了—只黄羊，虽然才6个月大，体重却达到42千克，体格健壮。王维春一下子意识到，这真是一只良种黄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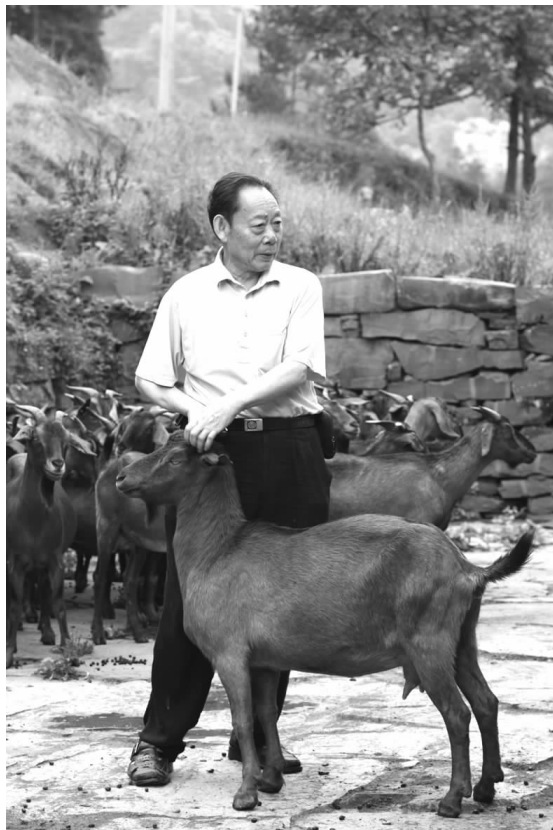
随着不断地发现，王维春保留这些具有优秀基因的个体，并集群养殖，创新性的提出并采取“限值留种”法和“群内分组、组间轮回”的交配方式及“以生产性能为主，结合外形、系谱选择建立群系”的措施，以及“加大选育强度与逐段加强培育相结合”的手段，有效解决了优良基因的保存、延续、扩大等关键问题。几年后，这里成功由生产型的畜牧场转变成繁育型的畜牧场。

如果说，发现这样的良种是一种偶然，那么王维春所有的付出和执着已经使“南江黄羊”的出现变成了必然！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测量用具，他在山上找一根弯头拐杖刻上刻度作测杖，将基建用废的皮尺剪下一节好的作软尺；没有编号用具，他找铁匠做号锤烙角编号，用耳缺剪剪耳记录原始号等等；在没有人工控制配种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他采用定期换种公羊的办法来弄清血缘、进行系谱记载；为解决饲草平衡供应，他和放牧人员越冬随羊野营河峪，自费购买冬性草种，并使用由老家寄来的彭州高杆玉米与苕子种，亲自进行饲料种植试验。就这样，他艰难地进

行品种培育的探寻。工作上，除整理资料外，他整天都待在羊群身边，夜间也常常以羊为伴住在岩洞，更无时间照顾家里。他在家陪伴妻小的时间极少，大年三十还奔波在大雪封盖了羊肠小道的荒野里，甚至在爱人生孩子时他也在外面。他常常白天随羊放牧观察羊群的生物学习性和性能、性状变化，晚上归纳整理资料，还抽时间读完了《世界农畜生理进展》一、二、三卷。

经过王维春十几年的独立探索和潜心研究，种畜场终于形成了被毛黄色、体格高大、肉用性能好的育种群，同时，他还撰写了“南江黄羊简介”上报地区。同年，达县地区农林局肯定了“南江黄羊”这一编名和性能，从此“南江黄羊”开始问世。此后，王维春相继主持和承担县、地、省科委和省畜牧主管部门，以及国家农业部下达的一系列有关南江黄羊育种和开发研究课题。他带领课题组的全体技术人员刻苦钻研，终于在“八五”期末使南江黄羊达到了肉用山羊新品种的要求条件和标准；他的科研项目“南江黄



王维春和南江黄羊^①

^①图片来源：本图片由作者提供。

羊肉用新品选育”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使南江黄羊成为了我国第一个肉用山羊新品种，他本人则被誉为“南江黄羊之父”。这是王维春用40多年的时间创造的奇迹。

岁月不居，不老情怀，谁来继续南江黄羊的辉煌

王维春就是这样一位校友，扎根大巴山深处，竟也能做出如此大的成绩。当他被问到要对母校说点什么时，他说，感谢当年的读书生涯给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自己的学习和科研能力。

当年他读书时正值国家“大跃进”时期，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并不浓厚，经常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打猪草，打牛草，样样都得干。刚到学校时，住宿也是个问题。同学们先后换了好几个地方，睡过教室，也打过地铺。有个记录是，一个年级的60个人，除了11个女生以外，其他人都是在一间大屋里打地铺——一排溜儿，四十多号人哪！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同学们的学习劲头依然很大。大家心里想：既然来了，就好好学，多学些东西，好报答祖国和人民！

好在当时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多，师资力量雄厚，有清末毕业的周同璧老师，有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毕业的柑桔专家江之鉴教授，还有风趣幽默学问极深的遗传繁育学老师钟光辉……虽然专业课程当中对羊的讲述相对比较少，但培养了王维春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同时大学四年有关理想信念奋斗的教育，让他有了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的特质。

当我们随着王维春老人再上北极种畜场的时候，才知道他退休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整整16年啊！但是对他来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还是那

么熟悉。见到了昔日的那些黄羊，他仍然能辨识出哪只小羊是哪只大羊的崽，哪只羊身上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拉着黄羊的耳朵，抱着黄羊的颈子，他像是对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现在的北极种畜场，羊舍和住房都得到了改善，还修建了一个简陋的篮球场。但是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和不足2000只的种羊，还是让我们感到了一些荒凉。除少数技术人员外，工作人员基本为当地村民，就是有中专文凭的也很少，而且多数工作人员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有事情才来山上。

王维春有太多的对比，他想起读大学的情景。

当年学校教授的课程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动物生理学、遗传繁育学、营养学、生理解剖学等等，而且还专门组织学生去屠宰场实地操作。而今天，学生们主要是在实验室分析、化验，就是不到农牧业生产实践中去，不到基层生产单位去，跟当年的培养模式很不一样。他希望母校在引导和培养学生们吃苦耐劳精神以及科研精神方面多下一番功夫，更希望在校学生们能够充分管理好时间，多学一些基础知识，要学会自学，要厚积薄发，也祈盼加大基层科技的经费投入，进一步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

他也感叹，原始粗放的饲养管理方式落后，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较差，消费市场薄弱等问题，都阻碍了“南江黄羊”的发展。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心情开始变得复杂：一方面，我们对于自己的校友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工作并做出成绩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也对今后“南江黄羊”的发展之路感到了一丝忧虑。王维春历尽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南江黄羊，谁来继续这个辉煌？

西南农学院师生学习毛泽东著作

□文/张晓华

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其时间跨度之长、影响之大、参加者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少见的。西南农学院在1958、1960年两次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这也可谓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

在1958年教育革命的推动下，西南农学院广大师生逐步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活动。



1958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农机系教师专研毛泽东著作^①



1958年，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热烈进行讨论^②



1959年西南农学院师生利用暑假加紧学习毛泽东著作^③

^{①-②}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③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2010-2011-SX19-3。

1960年1月18日,院党委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作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动员报告,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1960年1月25日,在学院第一次团代会上,通过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全院共青团员和青年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人人争做毛主席的“三好”青年的决议。团代会后,学院又提倡人不离书,书不离人,天天学,一早一晚学,见缝插针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全院出现了人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党委书记李兰同志动员全院
师生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①



学生认真阅读毛泽东著作^②

^{①②}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席卷全院,教职工在刻苦钻研^①

到 1960 年 3 月初,全院成立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 288 个。师生自建图书资料室 291 个,书刊发行站 9 个,拥有毛泽东著作及各种辅助文件 46 740 册。学院要求在学习上掀起“比、学、赶、帮”的热潮。



坚持不懈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农经系毛棋章同学正在写论文^②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性运动高潮中,到处都是学习小组在集体学习和讨论^③

^{①③}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②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毛泽东著作学习资料遍及全院^①



颂扬毛泽东思想的诗歌和学习毛泽东著作后写的论文、心得体会贴满了大字报栏^②

1964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开始发行,全院再次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院党委安排了13天的时间,组织在校的88位讲师以上的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



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积极开展学习^③

^①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4。

^{②-③}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 各系党支部书记集体自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①

▶ 农学系教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②



◀ 1964年,侯光炯院士学习毛泽东著作^③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学院党委、团委、工会都曾先后多次召开过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西南农学院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提高了全院师生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促进了师生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发挥了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被赋予复杂的政治含义,难免使学习活动出现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并助长了个人崇拜之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编辑 郭兰)

^①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②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③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侯光炯院士-侯光炯专题(一)。

反逮捕斗争

□文/牟乔雅

1947年，重庆学生在中共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北京、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决定在全市大中学生中举行罢课示威游行。不料国民党反动当局抢在了前头，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爱国学生运动进行疯狂镇压，开始逮捕进步同学。

6月1日，女师院所在地黄桷坪街上气氛异常紧张，到处都是鬼鬼祟祟的便衣特务。晚上女师院原准备在礼堂召开大会，由学生自治会主席汪盛荣布置第二天游行的有关事项，见情况不妙，便改在饭厅。她对同学们说道：如果特务抓人，就吹哨子集合。到了深夜一点钟的时候，宿舍所有的灯突然亮了起来，接着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敲门声，把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才发现宿舍前后门都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他们早已提前行动包围了学校。同学们预感到自己的行动已被泄密，马上镇定了下来，毫不畏惧地与他们展开了抗捕行动。他们迅速将宿舍门窗全部关上，特务不停地敲门，扬言要抓人，同学们毫无惧色地回答：“明天要上课，现在要睡觉。”特务见进不了门，便用刺刀使劲戳门，有的同学被刺伤了，仍奋力抵抗。前门虽然堵住了，军警特务却从后门不断地涌了进来。同学们厉声责问道：“为何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犯了什么法？”特务回答：“别让我们为难，我们这是奉命行事！”并开始分头搜查每间寝室。同学们迅速围成一道人墙，把汪盛荣围在中间掩护起来，特务逐室搜查后也没有找着要抓的人，正在疑惑中，突然看到一群

人老是围着不动，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把学生一个一个拖开后再用汪盛荣的照片一对照，很快便确定了她就是要抓的人。但同学们仍不甘心，拼命拉着汪盛荣不放，特务朝外拖同学们朝里拉，甚至把一个同学摔在地上拖了好远。就这样相持了好一阵，后来汪盛荣不忍心再牵连同学，连忙叫道：“同学们，放了我吧。”他们才松了手，特务趁机将汪盛荣抓走了。同时还抓走了其他寝室的一些学生，一起送到囚车上。看见并肩战斗的战友被抓走了，同学们心如刀割，不顾一切地穿起板板鞋（一种木头拖鞋）“啼啼、嗒嗒”的就往校门追，正看见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撤走包围学校的军警。大家气愤至极，纷纷脱下板板鞋，拣起小石块，向这些为虎作伥的军警扔去，特务威胁说要开枪，她们并不害怕，仍是拣到什么扔什么。特务迅速开走囚车，她们又跟着追了两三里路才作罢。在回校的途中，遇上了一个烫着头发，穿着兰布旗袍的女人，大家一下就认出，她经常到女师院伪装成进步大学生，其实是一个混在学生当中向反动当局告密的特务。大家一涌而上，把这个女特务摔在一个烂泥坑里，打的打，骂的骂，还有人顺手捡了一个烂瓜瓢，将烂泥往这个女特务头上、脸上乱浇一气，把她糊得像泥猴一样，大家把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全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她见众怒难犯，便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大家又追打了一阵，才余怒未消地回到了学校。

（牟乔雅根据《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史》（初稿）改编）

高校校史编研中的轻重得失及对策

□文/郑慧 李燕芳

高校档案编研工作是高校档案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推动高校教学、管理、科研等各项工作的有效途径。国家多项法律法规都对高校档案编研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修订)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国家教委1994年)第二章第十二条也对高校档案编研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高校档案部门应加强编研工作,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参加学校信息网络整体建设和校内编史修志,编写或配合有关部门编写重要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8年第27号令《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要求:“高校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展档案的编研工作。”

通过档案编研工作,把高校馆藏浩瀚的档案资料进行有目的的选题、选材、加工编辑、总纂和审核之后,以高层次的服务形式提供给高校教学、管理、科研等工作使用,有效地避免了重复查阅原始档案的繁琐,减少了对档案资料的磨损,大大提高了档案利用服务的效率,为高校各项工作的推进提供参考和依据,是推动高校教学、管理、科研等各项工作的有效途径。

在档案编研工作中,校史编研可谓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校史编研工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大量纷繁复杂的校史档案材料和文献基础上的。作为集中反映高校历史发展情况的校史档案,一般是经过筛选和整理的,主要包括声像档案、实物档案以及名人档案等具有现实查证作用的档案。从档案的内容看,它是从当时当事人直接使用的文件转化而来的,并非事后为使用而另行编制的,因此它客观地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从档案的形式特征看,文件上保留着真切的历史标记。有些文件材料的原文,原是当事人的亲笔手稿;不少

文件上留有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亲笔签署或批示;很多文件上盖有机关或个人的印信。^[1]校史编研有利于保存和见证学校的发展历史,传承学校文明,建设校园文化,为高校教学、科研以及党政管理等工作提供历史基础材料,启发创新思维。

1 校史编研中存在的轻重得失

一部优秀的校史,应该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重点与亮点大力突出,学术与人文相得益彰,语言文字优美隽永,酸甜苦辣白味俱陈。但从目前来看,鲜有校史能达到如此水平。具体而言,校史编研中存在以下轻重得失:

1.1 重“编”轻“研”

校史编研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编纂”,二是“研究”。编纂就是收集学校的历史资料,如教学、科研及党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大量的情况,以及大量前人的认识、建议、经验总结等。研究就是对所收集的校史资料进行研究,既有总体研究,也有专题研究,既有对事项的研究,也有对人物的研究,通过以上研究寻求规律性的总结。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一些学校把校史看成单纯的“大事记”,简单地把校史做一番罗列了事,把“编研”简化成“编纂”。

1.2 重“正史”轻“野史”

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角度来看,校史编研与国史编研如出一辙。“正史”往往是给领导和有关部门看的,语言文字中规中矩,遣词造句一丝不苟,文风不可谓不严谨。然而,如果哪位校友试图从校史中追寻往日菁菁校园里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那位可敬的老师,那个睡在上铺的同学,那个青春年少的自己,也许他只能空手而归。

1.3 重“基于文献的校史”,轻“口述校史”

校史一般有两种表现形态,即“基于文献的校

史”和“口述校史”。基于文献的校史往往通过搜集文字档案材料,并对之进行研究而形成结论。口述校史则通过对言传耳闻留下的传说、故事、轶闻、回忆录等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而获得相应的成果。然而,当前我国许多校史编研中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偏颇,“基于文献的校史”在校史中占据大半江山。

1.4 重“校史”轻“社会史”

学校作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的组织机构,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诞生、发展是离不开那个特定时刻的社会背景的。如果割裂学校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去孤立地谈论学校的历史,谈论学校的人物和事件,这样的校史必定是肤浅的,苍白的。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学往往与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等社会风潮的联系比较密切,不把校史与社会史之间的深刻关系揭示出来,势必会影响校史的质量和深度。

1.5 重“正面”轻“负面”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学校的发展也是如此,既有光辉历程、辉煌成就,也有走弯路、陷低谷的时候。但也许是顾及学校的形象和读者的感受,许多学校在校史编研中对成绩和辉煌浓墨重彩,大写特写,而对曲折和低谷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不计。^[2]

1.6 重“内容”轻“形式”

“内容”与“形式”各占多大比重才合适?不少校史在这方面花尽心思,权衡再三,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有些校史重“内容”轻“形式”,内容齐全如麻雀五脏,一应俱全,形式却编成了工作报告,一板一眼,使人捧读之,寡然无味。有些校史印刷装潢十分精美,但沿用传统的白纸黑字的形式,没有突破和创新。

1.7 共性多,个性少

随手翻开一本校史,内容不外乎历史沿革、领导关怀、光辉历程、辉煌成就、教学管理、科研成果、党建工作等,难脱窠臼,落入俗套,犹如老生常谈,而对学校的办学特色与优势、人文气息与思想理念等鲜明独特的个性,没有下工夫花笔墨去体现去渲染。

1.8 重“事”轻“人”

校史是一部人创造事物的历史,人和事是构成校史的两个基本要素。不少校史以时为“经”事为“纬”,充分地展现事物的发展脉络,却忽视了校史也

是育人的阵地,优秀的人物正是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生动范例,不充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将是校史编研的一大缺失。

1.9 重“正文”轻“辅文”

在校史编纂中,正文的编写总是一丝不苟,而辅文往往不受重视,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辅文包括评述性材料(注释、按语和序言)、查考性材料(年表、插图、备考和编辑说明)、检索性材料(目录、索引)。^[3]正文与辅文的关系好比红花与绿叶,没有辅文的说明、解释、提示以及引导,再好的正文也会令人读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2 校史编研中轻重得失的解决对策

2.1 “编”与“研”相提并重

校史编纂固然是档案部门的大事,但同时也要大力进行研究。研究可以是宏观的总体研究,包括学校的办学理念、教育思路、科研方向,也可以是具体的某一方面,如某个学科的发展、某个学院的专业设置、某个教学团队的师资整合、某类学生的培养等等。通过校史研究,可以使有关部门在规律性总结的基础上,对今后学校各方面的发展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2.2 大力编纂与“正史”配套的辅助性的史料丛书

如《老北大的故事》《北大旧事》,不见得读者就比北大校史少,影响就比北大校史小。云南大学校史办编研成果主要分为志书和史料丛书两大类,其中校志有《总述》《大事记》《党群志》《教学志》《科研志》《思想政治工作志》《成人教育志》《附属中学志》《后勤志》《人物志》共十卷;史料丛书有《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授文集》等。此外,还有一些校友会 and 历任学校领导、名人编写的校史编研成果,如《云大风云》《感悟云大文化》等。^[4]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档案馆从封尘收藏的近万张照片中辑录400余帧,以《岁月传真》为名,用定格光圈的瞬间,铺展历史的画卷,再现可敬可爱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还以《组织机构沿革》正本清源,推出《史迹拾翠》《教学建设集锦》《科研成果掇英》《创新实践巡礼》等一系列宣传学校建设轨迹和发展成果的文集、图册等编研成果。^[5]

此外,还可以编纂一些诸如“老照片”“建筑之光”“老传统”“友好往来纪念品图集”“舌尖上的某校”“川师生书画作品选”“校园风光摄影作品选”等校史丛书,从不同方面全方位地再现学校的曾经的岁月。

事实证明,较之“正史”,“野史”往往更能见一校之精神,更能“复原”历史上的校园生活,更能展现几代学人的“光荣与梦想”。^[6]

2.3 发掘“口述”史料,编纂口述校史

“基于文献的校史”和“口述校史”的区别不仅在于所采用的史料的载体不同,还在于行文风格、讲述角度的不同。两者好比大餐与小菜,不同的菜式迎合不同人群的口味。“口述校史”不仅在可信度上不亚于“基于文献的校史”,而且其或调侃闲聊或幽默诙谐的风格,犹如午后的一杯花茶,让人在弥漫的清香里,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永远留驻在心里的时间和空间,再走一次校园的小径,再听一回琅琅的书声,那种美妙的感受,是“基于文献的校史”无法给予的。

2.4 将“社会史”融入“校史”中

云南大学校史办通过编研志书和史料丛书,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学校的沧海桑田、历史渊源,从致公堂、会泽院到银杏道,从唐继尧到熊庆来、李广田,从私立云南大学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从“一二·一”运动到“七·一五”爱国民主运动,从李公朴到闻一多,从“培养人才,昌明学术”到“会泽白家,至公天下”,无不感受到云南大学的辉煌成就和非凡魅力。^[7]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5 适当分配校史中的“正面”材料和“负面”材料比例

站在学校的立场,当然希望留给上级部门和领导、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以及兄弟院校的都是美好的形象,在校史编研中把学校取得的成绩和辉煌作为重点突出展现,这无可厚非。然而,对于通过研究校史取得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更快更好地走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的部门和人来说,适当地采用“负面”材料,深刻地作出反思是可取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2.6 创新形式,载体多样化

在形式创新上,云南大学校史办编的《云南大学志》系列丛书,选择用“志书”这一体例来编排校史,是一种形式的创新。此外,跳出单纯文字编辑的老路

了,增加图片、画册的编写,在出版文字版校史的同时,增加光盘版(如拍摄专题片);可将档案原件尤其是比较精美的实物档案编入校史中,不仅增加校史的真实可靠性,还使校史图文并茂,更具可靠性、可读性和收藏性。^[8]

2.7 突出个性,凸显亮点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如何将其在校史中发挥出来,不少高校都做了有益尝试。如西南林业大学结合学校林业类本科综合院校的特点,校史编研工作的开展首先从具有优势的学科和数量较多的档案来进行。该校优势学科包括林学、园林、水土保持、木材科学等,这些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每年都承担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涉及很多本行业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西南林业大学还拥有两个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我国唯一一个国家高原湿地中心也挂靠在该校,依托这些强大的科研力量产生的丰富的科研成果都作为特色与优势写入校史中。再如广西民族大学在60年的办学实践中总结和凝练出该校的办学特色,那就是: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办学宗旨,利用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发展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特色学科,推进学科渗透,培养开拓性、创新性的实践型、应用型人才。^[9]《广西民族大学校史(2002-2011)》专门用一节对办学特色与优势进行专题阐述。

2.8 发挥优秀人物的模范作用

校园是塑造时代精英的阵地,每个高校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时代骄子,是践行校训的先锋模范,是育人树人的光辉榜样,是对学生进行理想和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手段。云南大学校史办编纂的《人物志》,将对学校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历任校长以及后勤员工等较为典型的云大教职员列入志书的选材范围。^[10]此外,还可以编纂“那些人,那些事(名人轶事)”“名师风采”“学子风貌”“老校友”等以人物为中心的校史丛书,发挥优秀人物的影响力。

2.9 认真对待校史中“辅文”的撰写

好的序言往往本身就是一篇高质量的科学论文,因此要求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同时,在写作技巧上,要求既能高度概括校史的内容,也要深入论述重点问题。序言写好了,能给校史起到提纲挈

领的作用。插图有助于读者对校史内容的形式的了解,可使读者看到内容反映不到的背景,是一些“虚”的材料内容的有力补充。但是一些校史把插图统统放在序言之前,与插图反映的具体文字内容相脱离,削弱了插图应起的作用,影响了校史的质量和效果,建议插图穿插于字里行间。附录是对正文没有涉及或不便罗列的相关信息以图表的形式所做的补充,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学校的各方面情况。广西民族大学校史的附录内容丰富,包括学校党政机构设置表、历任党政领导名录、各二级单位历任领导名录、历年正高级职称人员名录、历年师生人数、教学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专业学科情况、校训、校徽、校歌、学校地图、学院、中心简介等。^[11]

参考文献

- [1] 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9.
- [2] 梁卿.校史编研中的“四重”“四轻”及矫正对策[J].教学与管理 2008(11):12-14.
- [3] 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5.
- [4][7] 龚佳,杨晓敏.论高校校史编研与校园文化的传承——以云南大学为例[J].云南档案,2011(9):53.
- [5] 许防.试论高校档案编研工作[J].山西档案,2011(3):32.
- [6] 汪洪亮.略论大学校史研究与编纂[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24.
- [8] 郑重.浅谈高校档案编研工作发展策略[J].黑龙江档案,2012(1):100.
- [9][11] 《广西民族大学校史(2002-2011年)》编辑委员会.广西民族大学校史(2002-2011年)[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181,257-366.
- [10] 龚佳,杨晓敏.论高校校史编研与校园文化的传承——以云南大学为例[J].云南档案,2011(9):54.

(本文转自《档案学研究》2013年第4期,请作者与本刊联系。)

西南大学

关于征集校史资料和实物的通知

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

为进一步弘扬西南大学精神,更好地挖掘、搜集宝贵的校史资源,丰富校史馆藏品,推动校史研究,特向大家广泛征集西南大学校史资料和实物。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1906年川东师范学堂成立以来,学校在各个发展时期所形成的相关资料及实物。

二、征集内容

(一)上级领导、重要来宾、知名人士、杰出校友来校视察、参观、访问或讲演的相关资料。

(二)学校历任党政领导、知名教授的任命书、聘任书、论著、信函、手稿及在校期间使用过的有纪念意义的实物。

(三)涉及学校历史变迁的牌匾、碑刻(文)、拓片、文件、出版物、印刷品、纪念册(封)、徽标、印章、袖章等。

(四)校内各类重大活动、对外交流合作重大活动的相关资料。

(五)具有时代特征和代表性的教具。

(六)有关教学、科研、文体活动、生产实习的照片和实物资料以及师生员工在校期间使用过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相关证件。

(七)国内外机构、海内外各界人士、校友捐资助学的资料、照片等。

(八)能够反映学校历史变迁的其他资料和实物。

三、征集方式

(一)捐赠。凡捐赠校史资料或实物者,学校将颁发捐赠证书以志纪念。

(二)借展。在持有者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借用展示的方式弥补校史资料的缺失。

(三)代管。对珍贵的校史资料或实物,学校可代为保管(双方签订保管协议)。

(四)复制。通过复制方式获得校史资料的呈现。

(五)转让。对珍贵的校史资料或实物,在持有者自愿、双方协商的基础上,学校可以合理价格进行购买。

四、征集时间

2014年5月1日-12月31日止。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

联系人:郭兰、刘润、张晓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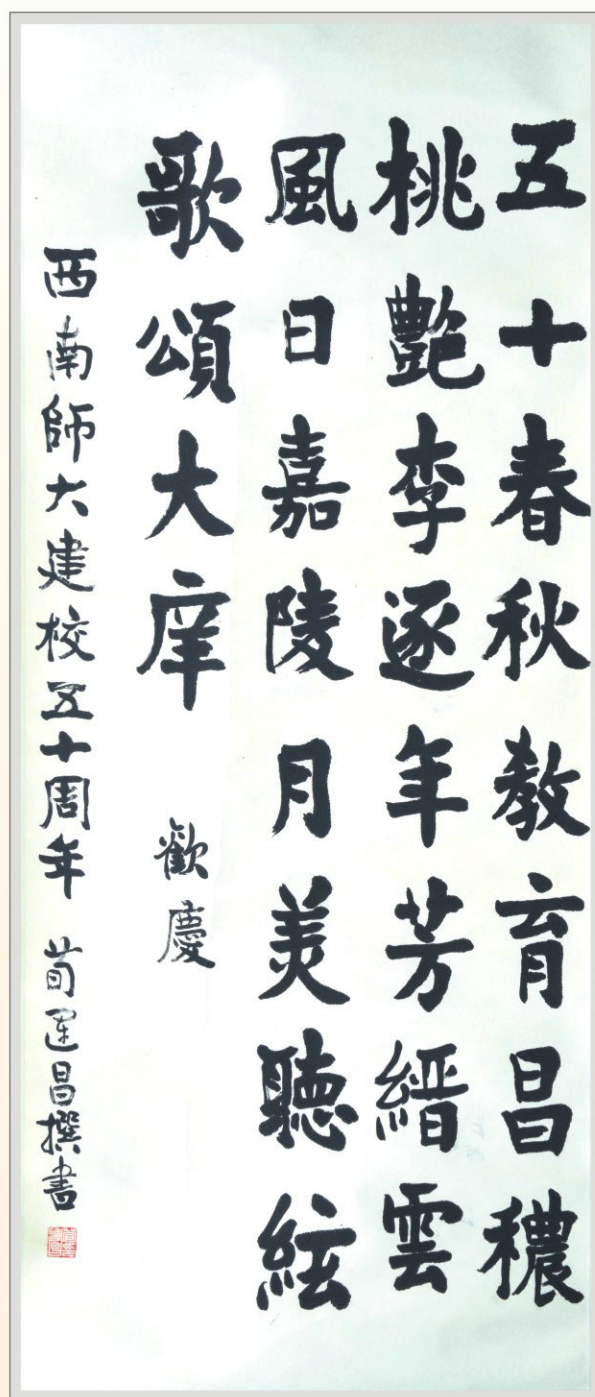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023-68250107

E-mail:xndxsg@126.com

特此通知。

西南大学

2014年5月12日



荀运昌^①书法作品^②

^①荀运昌（1921-2008），男，陕西西安人。1950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52年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87年评聘为教授。曾经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重庆市书法协会会员，重庆诗词学会顾问。

^②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H12-15。